

秋葉原無差別殺傷事件に関する研究
—メディア報道の社会的分析を中心に

日本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研究
—媒體報導的社會性分析

A Study on the Akihabara Massacre in Japan: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Media Reports

研究生：趙翎君

指導教授：陳永峰 博士

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碩士論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碩士論文題目：

秋葉原無差別殺傷事件に関する研究
—メディア報道の社会的分析を中心に

日本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研究—媒體報導的社會性分析

A Study on the Akihabara Massacre in Japan: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Media Reports

研究生：趙翎君

指導教授：陳永峰 (簽章)

審查教授：何恩培 (簽章)

鄭志誠 (簽章)

曾從鋒 (簽章)

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摘要

2008 年發生於日本東京都秋葉原行人徒步區的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被日本媒體稱為「過去 30 年間死傷最慘重」的隨機殺人事件，在當時造成日本社會的極大衝擊。事件發生後，日本各界對於加害者加藤智大進行了徹底的分析，從家庭教育再到工作環境及人格特質等，試圖透過研究加害者的生活環境與社會背景，找出隨機殺人事件一再發生的原因。其中，日本媒體對於事件及加害者的報導，不僅是社會理解事件經過的主要管道，同時對於社會如何看待事件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因此在研究隨機殺人事件存在於日本社會的意義時，調查媒體對於事件的報導方式及態度具有其必要性。

本論文透過爬梳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的背景，並以《讀賣新聞》、《朝日新聞》及《每日新聞》的報導為研究對象，整理日本媒體對於事件的相關報導，分析報導內容及描述方式，藉以觀察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在報導中的模樣，並解釋隨機殺人事件與日本社會之間的關聯性，期盼提供台灣社會在面對及檢討隨機殺人事件時的參考依據。

關鍵字：隨機殺人、無差別殺人、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媒體報導、報紙媒體、時代性、加藤智大

要旨

2008年に東京都の秋葉原歩行者天国で発生した秋葉原無差別殺傷事件は、日本のメディアによって「過去30年で被害最悪」の無差別殺傷事件と報道された。当時、その事件は日本社会に大きな衝撃を与えた。事件発生後、日本社会は加害者の加藤智大の家庭教育から労働環境と激昂しやすい性格までを徹底的に分析し、加害者の生活環境と社会背景を研究することを通じて、無差別殺傷事件が何度も発生する原因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した。その中で、メディアの報道は事件に関する情報を得る重要な手段として使われているだけでなく、事件に対する社会の反応にも影響を与える。したがって、日本における無差別殺傷事件について研究するために、事件に関する日本メディアの報道の内容を調査することが必要だと思われる。

本稿では、『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毎日新聞』を対象として秋葉原無差別殺傷事件に関する報道を研究する。そして、報道の姿勢と描写の仕方を分析することを通じて、日本メディアの報道における秋葉原無差別殺傷事件の様子を考察し、事件と日本社会との関連性を明らかにする。また、秋葉原無差別殺傷事件について研究した上で、台湾社会に無差別殺傷事件に対する対策と検討のあり方を提供する。

キーワード: 通り魔、無差別殺傷事件、秋葉原無差別殺傷事件、メディア報道、新聞報道、時代性、加藤智大

謝辭

大約一年半前，還在日本關西學院大學當交換學生的我，有幸選修了一堂與社會文化及媒體相關的研究生課程。其中一位教授談及我的論文時，隨口問了我：「寫這個題目不會覺得很痛苦嗎？要看這麼多沉重的資料。」當時論文還處在尋找方向的階段，於是我回答：「應該是還好」。直到論文完成並思索著謝辭內容的此刻，我忽然又想起了當時的那句「還好」。如果能回到過去，我肯定會回答教授：很痛苦，是非常的那種。

有經驗的人總說，寫論文是孤獨的。我雖然也在這個過程中感受到了「孤獨」，但體會更多的或許是文中那些事件加害者的「孤獨」，以及被留下的遺族們的「孤獨」，而這也使我在撰寫這篇論文時嚐到了前所未有的拉扯。無法單方面的體諒加害者的遭遇，也無法單方面的同情被害者的不幸，總是無法好好抽離情緒，卻必須在報導與文獻中尋找答案這點，或許是使我痛苦的主因吧。但即使曾感到痛苦，寫論文的過程仍然是有趣的，更感謝陪我撐過來的許多人。

從題目的確立到論文的完成，最感謝的是我的指導教授陳永峰老師。如果沒有您的細心指導，以及每次開會後都提醒我先沉澱一下思緒再動筆，並給予我莫大的信心與鼓勵，我想我大概已經迷失在大量的報導中，並輸給了我自己。感謝我的口試委員何思慎老師、鄭志成老師、以及曾耀鋒老師，在口試的過程中給予許多指導與建議，協助我完成這份論文。感謝一口答應擔任口試主持人的蕭幸君老師，無論是在大學時期或是研究所，當然還有 **Media Project** 的課程中，總是給予學生滿滿的能量與獨立思考的機會，能夠在學生時期遇見您，我認為自己很幸運。從大學時期的課程、專題研究、再到碩士論文等，謝謝一直以來都給予我許多幫助的笹沼俊暁老師，如果沒有您的協助，我相信這份論文不會這麼順利的完成。感謝在中間發表為我擔任主持人的林珠雪老師，從大學時期的奈良ツア一再到研究所，每次遇見您都有種安心又被治癒的感覺，您是研究生們的心靈支柱。感謝工藤節子老師一直以來的鼓勵與關心，雖然已經提過好多次，但我還是要說，沒有台日交流就沒有現在的我。謝謝曾在研究所指導過我的古川ちかし老師、大西仁老師、金想容老師、黃淑燕老師、松永稔也老師、張瑜珊老師、Teja Ostheider 老師，以及所有東海日文的老師們。

另外也要感謝關西學院大學的老師們和所有的留學生夥伴，特別是協助我資料收集的湖南大學的溫雪燕，你真的特別特別棒！還有絕不能忘記的東海日研所的夥伴們，每天聽我抱怨東抱怨西的，十句有八句是喪氣話，剩下兩句連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真是難為各位了。謝謝你們的陪伴與鼓勵，也希望你們今

後一路順遂，最愛你們了。最後謝謝我的家人，無論何時都願意支持我，也謝謝柚子和花花，陪我度過每個熬夜的時刻。

雖然仍有許多的不足，但希望這是一篇讓人願意從頭讀到最後一個字的有趣論文，那便是作為研究生的我莫大的榮幸了。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媒體現況.....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7
第四節 文獻回顧.....	10
第五節 論文的架構.....	12

第二章 秋葉原事件與日本社會的應對

第一節 加藤智大的背景.....	14
第二節 事件前的社會性「位置」.....	16
第三節 事件後的公共安全檢討.....	19
第四節 事件背後的社會因素.....	21
第五節 小結.....	26

第三章 媒體筆下的秋葉原事件

第一節 報導中的加害者與受害者形象.....	27
第二節 檢方在精神鑑定上的戰術與媒體關係.....	35
第三節 死刑執行下的報導爭議.....	37
第四節 媒體對類似案件的回顧.....	40
第五節 小結.....	45

第四章 隨機殺人的「時代性」

第一節 加害者的主張與矛盾.....	46
第二節 從秋葉原事件看北捷事件.....	50
第三節 隨機殺人時代中的「我」.....	52
第四節 小結.....	54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56
一 秋葉原事件中媒體的角色.....	56
二 個人因素 vs. 社會因素.....	57

第二節 今後の研究課題.....	59
參考資料.....	60

圖表目錄

表 1	媒體對加害者的生活背景報導.....	28
表 2	媒體對加害者的形象描述.....	30
表 3	媒體對被害者的報導內容.....	3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008年6月8日下午12點33分，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發生震驚日本社會的隨機殺人事件，犯人加藤智大（下稱加藤）犯案時年僅25歲，駕駛貨車穿越十字路口衝進位於秋葉原的行人徒步區，先是撞倒5名路人，隨後持刀下車砍殺周圍的行人，造成7人死亡10人受傷的慘劇，又稱「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下稱秋葉原事件）。事件發生後，日本《產經新聞》第一時間以「過去30年間死傷最慘重」¹為標題報導此事，儘管自平成年代以後所發生之隨機殺人事件的死傷人數來看，2001年發生於日本大阪教育大學附屬池田小學的隨機殺人事件傷亡最甚²，然而以「道路惡魔」³的定義來看，秋葉原事件確實是日本在過去30年間死傷最慘重的案件。由於犯案地點選在人潮聚集的公共場所，隨機挑選素未謀面的行人下手，且加藤在犯案前曾在網路留言板上多次預告殺人，造成日本民眾對於隨機殺人的恐慌，位於秋葉原的行人徒步區也在事件發生後一度封閉。隨著社會對於事件的高度關注，犯人及其家屬的個人情報也透過媒體一一被攤在陽光下，包含加藤過去所就讀的學校、工作環境、人際關係、以及家庭組成等，迫使加藤的雙親於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在媒體的包圍下公開道歉，其長相與住家環境也因此曝光。

然而，媒體及輿論的追殺並未因為這場記者會而停止。事件發生6年後（2014年），加藤的弟弟加藤優次（化名）因不堪媒體騷擾與來自社會的壓力，以自殺的方式結束生命，當時年僅28歲。生前加藤優次將250張A4大小的手稿寄給講談社《週刊現代》的記者齋藤剛，並在手稿中提到，即使數次搬家，只要一完成住民登錄⁴立刻會有記者找上門來，他們不斷撥打內線對講機，甚至胡亂拍打住家大門使他倍受煎熬，無論怎麼做都無法逃離作為殺人兇手弟弟的夢魘。回想

¹ 產經新聞〈秋葉原通り魔事件 犯行使用のナイフとは別の刃物も所持 過去30年で被害最悪か〉，2008年6月8日，取自：<http://sankei.jp.msn.com/affairs/crime/080608/crm0806082203036-n1.htm>，2017/11/14 閱覽。

² 2001年6月8日發生於大阪府池田市大阪教育大學附屬池田小學的隨機殺人事件。犯人宅間守（後於獄中結婚，從妻姓改名為吉岡）在服用過量精神安定劑後，闖入校園內隨機砍殺師生，造成8名兒童喪生，15名師生輕重傷。2004年9月14日被處以絞刑，直至死刑執行前都未向被害者家屬致歉。參照2001年6月9日《讀賣新聞》東京朝刊報導，2017/11/14 閱覽。

³ 日文「通り魔」（とおりま）直譯。關於「隨機殺人」與「道路惡魔」之區別，請參照本章第三節「研究方法與限制」。

⁴ 根據日本「住民基本台帳法」規定，為紀錄居住關係並保障國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選舉投票等權益，各市區町村居民皆需完成住址、家庭構成等事項的登記。

秋葉原事件發生後的生活，加藤優次在文章中寫到⁵：

事件發生後將近 6 年的時間，我明白了自己終究是犯人的弟弟。加害者的家屬是不允許得到幸福的，這就是現實。所以我決定放棄活下去。比起去死，已經沒有能讓我選擇活下去的理由了。無論怎麼想都想不到那樣的理由。難道會有嗎？有的話，請你告訴我吧。

加藤優次自殺後，台灣媒體也曾以「不配擁有幸福」⁶為題報導加害者家屬所面臨的困境。2014 年 5 月 21 日，也是加藤優次自殺報導刊載的一個月後，台北捷運發生台灣史上最嚴重的隨機殺人事件（下稱北捷事件），犯人鄭捷（當時 21 歲）持刀在車廂內隨機砍殺乘客，一共造成 4 人死亡 24 人受傷。事件發生後，鄭捷的弟弟第一時間趕往江子翠派出所探視，一路上遭到大批媒體包圍，最終在警方的保護下掩面步入派出所。⁷如同幾個月前不堪媒體騷擾及輿論壓力而選擇自殺的加藤優次，鄭捷弟弟的年齡、就讀學校等個人資料被公開在報章雜誌上。⁸以媒體報導為首，加害者家屬的個人情報遭到公開的情形在北捷事件與秋葉原事件當中都有相同的影子，而這種究責式的報導方式在日本也引發多起加害者家屬自殺的案件，如前述的秋葉原事件，以及 1988 年東京・埼玉連續幼女誘拐殺人事件⁹中的加害者父親，最終也因社會的責難自殺身亡。

秋葉原事件發生後，日本社會試圖解釋加藤智大的犯案動機，從最初的家庭教育、宅男¹⁰、人際關係，再到派遣制度、社會地位等，除了個人的成長環境，也試圖從社會背景的角度分析加害者與隨機殺人事件之間的關聯性，雖然至今仍無法完全闡明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隨機殺人事件也未曾在日本社會停歇過，卻

⁵ 齋藤剛，〈独占スクープ！秋葉原連続通り魔事件そして犯人（加藤智大）の弟は自殺した〉，《週刊現代》，2014 年 4 月 26 日號，（東京：講談社，2014），頁 56-61。

⁶ 范倚菁，〈「不配擁有幸福」日本秋葉原殺手弟自殺、母崩潰、父隱居〉，三立新聞網，2014 年 5 月 24 日，取自：<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4467>，2017/5/26 閱覽

⁷ 聯合影音，〈鄭捷連行兇 弟弟警局崩潰痛哭〉，取自：<https://video.udn.com/news/132014>，2017/5/25 閱覽。

⁸ TVBS，〈這輩子毀了！鄭捷雙親痛哭難以承受〉，2014 年 5 月 22 日，取自：<http://news.tvbs.com.tw/local/532520>，2017/5/25 閱覽。

⁹ 發生於 1988 年至 1989 年間，日本東京都與埼玉縣的連續女童誘拐事件，又稱「宮崎勤事件」。犯人宮崎勤連續誘拐並殺害 4 名幼女，於 2008 年 6 月 17 日被處以死刑。犯案後宮崎勤曾將被害者遺體的相片寄到報社及被害者家屬的家中，且直到死前都未向被害者家屬致歉，甚至主張自己的無罪與人權，二次精神鑑定曾被認為具有多重人格及綜合失調症等精神障礙。參照朝日新聞，〈反省・謝罪ないまま「次は、自分の番だ」連続幼女殺人事件の宮崎死刑囚に刑執行〉，2008 年 6 月 17 日夕刊，1 社會 15 頁，2017/1/4 閱覽。

¹⁰ 這裡指日文中的「オタク」（OTAKU），2008 年 6 月 18 日的報導中，《產經新聞》曾引述加藤智大友人的言論，將喜愛二次元作品的加藤智大指為「オタク」，而台灣媒體則以「宅男」一詞形容喜愛電玩的鄭捷，因媒體的敘述方式相似，故這裡參考台灣對於「オタク」的翻譯。

促使他們重新檢視事件背後所存在的社會問題。反觀台灣社會，雖然嘗試從加害者的家庭背景與犯罪心理分析事件的起因，但多數評論引述媒體報導之「喜愛殺人格鬥電玩」¹¹、「家住豪宅開名車」¹²等字句，營造加害者宛如「惡魔」的形象。此外，被引用的報導內容與檢調單位調查之加害者的成長背景也有出入¹³，社會的輿論走向已經明顯受到影響，媒體卻未曾針對過去的報導做出更正或深入調查。參照了這些報導的學者及各機關所做出來的研究，是否因先入為主的觀點而失去事實查證的積極性是其中一個問題，倘若進一步影響社會對於隨機殺人事件的理解，將不利於探究事件背後所隱藏的更多社會性問題。

北捷事件並非台灣首起隨機殺人事件，在此之前亦有黃富康隨機殺人事件¹⁴及曾文欽隨機殺人事件¹⁵為前例，但以規模及對社會造成之衝擊來看，北捷事件仍然是台灣犯罪史上無法忽視的重大刑案，了解其背後所代表的意涵與「時代性」是減少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的方法之一。然而，以北捷事件的加害者鄭捷在事件後短短兩年內就被槍決，且媒體與各界也在鄭捷伏法後鮮少回顧事件的情況來看，「死刑」彷彿等於「結束」一般，對於隨機殺人的議題社會已經出現了討論停滯的現象。

在相似的犯罪類型與社會背景之下，日本在秋葉原事件發生後如何檢討隨機殺人與時代之間的關聯性，而媒體的報導又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本論文將透過爬梳秋葉原事件的背景，並觀察媒體報導的走向，分析秋葉原事件在媒體筆下的模樣與日本社會的應對方式，提供台灣社會在面對隨機殺人事件時得以比較與參考的對象。

¹¹ 王雅慧，〈沉迷電玩 殺越多人越高分〉，蘋果日報，2014年5月22日，取自：<https://tw.news.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40522/35845940/>，2017/11/15 閱覽。

¹² ETtoday 新聞雲，〈家住豪宅開名車 鄭捷仍然不滿足：我小學就想自殺...〉，2014年5月22日，取自：<https://goo.gl/zM2p34>，2017/12/1 閱覽。

¹³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3 年度矚重訴字第 1 號〉，2015年3月6日，取自：<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2017/12/2 閱覽。

¹⁴ 2009年3月9日發生於台北士林區，犯人黃富康（當時36歲）依照事先抄錄的租屋資訊逐一連絡名單上的房東，後與接通電話的第四位房東相約租屋處碰面。黃富康趁入內觀看屋況時，持預藏的榔頭及刀子將房東殺害，隨後在死者身上搜出身分證，依據地址來到死者住所，謊稱與屋主談好租屋條件進入屋內砍殺屋主妻子及兒子。被捕後黃富康向警方供稱，犯案動機為心情不佳、吸毒後想殺人。最高法院判處死刑定讞，目前仍在等待死刑執行。參照錢利忠，〈台灣隨機殺人案始祖 槍決名單上總少了他〉，自由時報，2016年3月28日，取自：<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646781>，2017/11/15 閱覽。

¹⁵ 又稱「台南湯姆熊事件」，2012年12月1日犯人曾文欽（當時30歲）以贈送遊戲卡為由，誘騙10歲男童進入遊戲中心店內廁所，隨後將男童殺害。曾文欽被捕後向警方供稱犯案曾上網查過資料，在台灣殺1、2個人不會判死刑，因此希望能被關在牢裡一輩子，如果犯案後沒有被捕，還要再殺人直到被捕為止。最終被判無期徒刑、褫奪公權定讞。參照蘋果日報，〈殺1、2人不會判死？ 割喉殺童男免死定讞〉，2016年5月5日，取自：<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60505/853881/>，2017/11/15 閱覽。

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媒體現況

由於秋葉原事件及北捷事件的犯人皆刻意挑選人潮聚集的場所對路人進行攻擊，且都是具有計畫性的預告型犯罪，再加上犯案後並沒有明顯的逃跑意圖，可知犯人對於被捕後的下場並不畏懼。從兩起事件更可觀察到，「隨機殺人」這類型的犯罪不僅引發社會對部分族群的恐懼，毀壞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甚至提供後人模仿犯罪的可能性，因此相較於其他因金錢、情感等因素而犯下的兇殺案件，隨機殺人事件對社會造成的衝擊更為顯著。事實上在北捷事件發生後，台灣媒體多次引述日本秋葉原事件作為隨機殺人的比較案例，如《三立新聞》及《中國時報》分別在北捷事件發生當週接連引述《週刊現代》內容，報導秋葉原事件犯人加藤智大的親弟加藤優次因不堪輿論壓力與媒體騷擾而選擇自殺的消息，對照意味濃厚。¹⁶謝煜偉也曾在台灣國際廢死研討會上以秋葉原事件為例，說明日本社會如何解析秋葉原事件中的加害者背景以及最終的審判結果，並探討刑事案件中關於人性與死刑之間應有的界定。¹⁷

辨明秋葉原事件的社會背景，有助於理解隨機殺人事件在現代社會中所隱含的意義，而媒體的報導正是事件發生後，得以在第一時間向大眾傳遞訊息、影響輿論走向，甚至反映社會對事件之看法的媒介。因此，分析媒體如何描繪秋葉原事件的樣貌，可視為是窺探案發當時社會反應的手段之一。劉育偉、許華孚在法務部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出版的《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中，將鄭捷的犯罪成因指向家庭功能失調及學校危機意識不足。¹⁸其中針對鄭捷成長背景之描述，並未採用新北地方法院的判決加以佐證，而是參照維基百科網站刊載的情報，當中的資料來源多數引用自媒體未經過查證之報導。由此可知，媒體報導對於分析北捷事件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卻因報導過於傾向對加害者的形象塑造與外界的批判，內容不僅難以舉證，更與檢方調查之結果有所出入，造成事件的情報無法完整傳遞，甚至有誤導之虞。根據 1996 年 3 月台灣新聞記者協會通過的 12 點〈新聞倫理公約〉，媒體在撰寫報導時包含了以下規範¹⁹：

¹⁶ 范倚菁，〈「不配擁有幸福」日本秋葉原殺手弟自殺、母崩潰、父隱居〉，三立新聞網，2014 年 5 月 24 日，取自：<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4467>，2014/5/24 閱覽；黃菁菁〈秋葉原事件 凶手弟自殺、家崩毀〉，中國時報，2014 年 5 月 28 日，取自：<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528000366-260102>，2014/5/28 閱覽。

¹⁷ 謝煜偉，〈鬼島生與死：人、人魔、殺人魔 (Life and Death in Taiwan: Humans, Human Monsters and Those Who Kill the Monsters)〉《「鬼島」生與死：2014 台灣國際廢死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Life and Death in Taiwan》演講稿，2014 年，取自：<http://www.taedp.org.tw/node/2769>，2017/6/14 閱覽。

¹⁸ 劉育偉、許華孚，〈以鄭捷北捷隨機殺人案之生命歷程探討暴力犯罪成因及其預防〉《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18，（法務部犯罪防治研究中心，2015）。

¹⁹ 參照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網站刊登之〈新聞倫理公約〉，取自：<http://www.atj.org.tw/>，2017/12/11

- (1) 新聞工作者應抗拒來自採訪對象和媒體內部扭曲新聞的各種壓力和檢查。
- (2) 新聞工作者不應在新聞中，傳播對種族、宗教、性別、性取向身心殘障等弱勢者的歧視。
- (3) 新聞工作者不應利用新聞處理技巧，扭曲或掩蓋新聞事實，也不得以片斷取材、煽情、誇大、討好等失衡手段，呈現新聞資訊或進行評論。
- (4) 新聞工作者應拒絕採訪對象的收買或威脅。
- (5) 新聞工作者不得利用職務牟取不當利益或脅迫他人。
- (6) 新聞工作者不得兼任與本職相衝突的職務或從事此類事業，並應該迴避和本身利益相關的編採任務。
- (7) 除非涉及公共利益，新聞工作者應尊重新聞當事人的隱私權；即使基於公共利益，仍應避免侵擾遭遇不幸的當事人。
- (8) 新聞工作者應以正當方式取得新聞資訊，如以秘密方式取得新聞，也應以社會公益為前提。
- (9) 新聞工作者不得擔任任何政黨黨職或公職，也不得從事助選活動，如參與公職人員選舉，應立即停止新聞工作。
- (10) 新聞工作者應拒絕接受政府及政黨頒給的新聞獎勵和補助。
- (11) 新聞工作者應該詳實查證新聞事實。
- (12) 新聞工作者應保護秘密消息來源。

此公約除了落實新聞自由、保障新聞工作者的獨立自主，也期盼提升新聞報導的專業水準，並落實媒體作為社會公器之責任。²⁰其他媒體單位同樣設立了各自的報導自律原則，如《公共電視》於 2007 年修訂的〈公廣集團新聞專倫理規範〉裡提到「新聞首重查證，避免捕風捉影、道聽塗說，也絕不容許刻意曲解事實。若有錯誤，應立即更正」²¹，在採訪方式方面，則設有「不可過度侵擾悲劇或災難受害者。慎重處理死、傷者畫面，避免特寫或過度強調血腥。尊重死者，除非有不得已的原因，不得播出屍體畫面」²²等規範。此外，《TVBS》也在自家網站上刊登〈新聞自律規範〉，如面對災難或死亡悲劇時，需保持距離並尊重受

閱覽。

²⁰ 參照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網站內容，取自：<http://www.atj.org.tw/>，2017 年 12 月 10 日閱覽。

²¹ 參照公共電視網站刊載之〈公廣集團新聞專業倫理規範〉，取自：https://info.pts.org.tw/open/data/prg/2007news_ethics.pdf，2017 年 12 月 10 日閱覽。

²² 同上註。

受害者家屬或傷者不被打擾的權利，以及在採訪現行犯時，在警方未查知其犯行前，應在採訪前通知警方且不得 LIVE 直播等。²³然而公約設立容易，落實卻相當困難，觀察近年來媒體對刑事案件的報導方式與內容，特別是在尊重當事人隱私權及不過度煽情、誇大、甚至不實報導的部分，實在與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所設立的公約及各家媒體的自律規範，有著一段遙遠距離。

作為研究機關與社會回顧事件的情報來源，日本同樣也必須面對媒體報導帶來的問題。早在 1946 年，日本新聞協會制定了〈新聞倫理綱領〉，並於 1948 年 3 月公布「編輯權聲明」，以這兩項規範做為日本媒體報導的準則（舊制的〈新聞倫理綱領〉已於 2000 年 6 月改訂為新制，但關於報導倫理的構造並沒有太大的更動），要求新聞記者必須維持真實的報導與公正的評論，且在編輯權上不可遭受外部或內部刻意的侵害。²⁴此外《東京電視台》等各大媒體也有一套自律規範。然而就如同台灣的情況，在規範的落實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更引發不少違反新聞倫理的事件，如犯罪被害人受到媒體騷擾等情形層出不窮。對此，日本在法律上針對犯罪被害人制定了一套報導原則，以保障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其權利與隱私不受到媒體報導的侵害。

2004 年 12 月，日本公布「犯罪被害人等基本法」，並在基本計畫案的草案條款上，將對外說明案件內容時，被害人以實名亦或匿名公布的判斷權力賦予警察單位。²⁵此舉引發了日本弁護士連合會與各家媒體的反彈，質疑「匿名發表」給予搜查單位恣意操作情報的可能，一旦媒體無法監督警察機關的調查進度，將阻礙媒體採訪與報導上的自由，進而損害民眾知的權利。²⁶日本新聞協會也以「為將事件與事故正確、客觀地取材、檢驗及報導，實名發表是不可或缺的」等理由，要求撤除草案。然而，考量該基本計畫案是基於國民的意見所制定，因此於 2005 年 12 月 27 日決議維持計畫案內容²⁷，其中犯罪被害人的聲音成了重要的關鍵。對於被害人及其家屬來說，匿名發表成為避免他們受到「二次被害」的唯一防線，特別是在遭受肉體或精神上的傷害後，因為實名發表的緣故，而被迫忍受世人好奇的目光及媒體騷擾等情形更是時有所聞。²⁸無論是匿名發表亦或實名發表，媒體報導的態度都將為受害者及其家屬帶來巨大的影響，倘若沒有完善的法律制度

²³ 參照 TVBS 網站刊載之〈新聞自律規範〉，取自：<http://www.tvbs.com.tw/news-rule>，2017 年 12 月 10 日閱覽。

²⁴ 大石泰彦，〈報道倫理に関する一考察—日仏の制度を比較して—〉《関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紀要》，94，（関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研究会：2003），頁 17-28。

²⁵ 大月晶代，〈犯罪被害者の情報と報道のあり方〉《レファレンス》，56（8），（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調査及び立法考査局：2006），頁 54。

²⁶ 同上註，頁 55。

²⁷ 同上註，頁 54。

²⁸ 同上註，頁 55-56。

保障，就只能仰賴媒體自律。

相較於受害者，加害者及其家屬的處境更加嚴苛。如前所述，日本曾發生多起因媒體報導所造成的加害者家屬自殺的悲劇，對於加害者家屬的保護也逐漸成為日本社會注目的議題。日本《每日新聞》曾以「支援加害者家屬『與我們切身相關』」為題，描述加害者家屬所背負的社會壓力及艱難處境，例如在校遭受霸凌、被公司辭退、不斷搬家等，接到「去死吧」、「殺人犯的小孩」這一類的謾罵電話與騷擾更是家常便飯²⁹，對加害者家屬的支援雖然日漸受到日本社會的重視，但仍然不算是相當普遍的概念。2017年10月，《中國時報》曾以「加害者家屬的原罪 搬家數次屢遭霸凌」為題，報導日本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World Open Heart³⁰來台參與研討會，與學者進行受刑人人權與家庭議題的交流分享，並提及受刑人與其家庭所承受的社會歧視問題。³¹然而回顧2014年5月北捷事件發生隔日，《中國時報》就曾在電子報上刊登犯人鄭捷的弟弟抵達警局接受偵訊時的照片，並在報導中清楚寫出其年齡及住家位置³²，無疑是加劇社會對加害者家屬歧視的共犯。像這樣一邊宣導加害者家屬人權的同時，一邊透過報導將加害者家屬的訊息攤在陽光下的行為，在台灣媒體的新聞報導中並不算少見，也成為了台灣社會的一大隱憂。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媒體的報導除了具有傳遞情報的功能之外，也有過濾資訊、決定社會的注目焦點與影響輿論走向的能力存在，作為研究隨機殺人事件的第一手情報來源，媒體的報導內容往往扮演著關鍵的角色。過去民眾獲得新聞資訊的來源以傳播速度較快的電視媒體為主，但由於受到播報時間限制，訊息量不比報紙媒體廣泛，報紙媒體在訊息的保存及查閱的功能上，無論是完整性還是取得容易度也勝過電視媒體，讀者可以不受時間拘束，隨時隨地重複閱讀資訊。與報紙媒體類似型態的還有雜誌、週刊及月刊，其所刊載的訊息雖然同樣具有報紙媒體的優點，但由於發刊時間間隔較長、即時性不足，讀者群和影響力都沒有每日發行的報紙來的廣

²⁹ 每日新聞，〈加害者家族支援 「人ごとではない」〉，2017年9月6日地方版，取自：<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170906/ddl/k39/040/553000c>，2017/12/10 閱覽。

³⁰ 日本宮城縣仙台市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World Open Heart <<http://www.worldopenheart.com/index2.html>>，成立於2008年，是日本首個以犯罪加害者家屬為支援對象的NPO團體。

³¹ 洪安怡，〈加害者家屬的原罪 搬家數次屢遭霸凌〉，中國時報，2017年10月5日，取自：<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1005002407-260405>，2017/12/11 閱覽。

³² 陳俊雄，〈鄭捷父母：兒沒事就宅在家 沉溺格鬥電玩 捅人當 Game〉，中國時報，2014年5月22日，取自：<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522000386-260102>，2017/12/11 閱覽。

泛。此外，雜誌、週刊及月刊的撰寫方式多為分析或深度報導，無法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一時間反應出媒體與社會最直接的應對，因此在本論文中僅作為輔助資料參考，不進行統整與詳細比較。

以當前的媒體型態來看，網路新聞因具有比報紙媒體更迅速的即時性，且版面不受限制，可同時刊載大量彩色圖片及影片，又兼具透過網路得以輕鬆傳播的便利性，較受到有網路使用習慣的現代人青睞。然而網路新聞的真實性時常遭受質疑，根據日本總務省情報通信政策研究所的報告顯示，在日本最受到信賴的媒體為報紙，獲得將近七成的信賴度，其次則是電視新聞，網路排在第三，且信賴度不到三成。³³綜合以上觀點，並考量現今網路的普及，經過電子化統整的報導無論在傳播力與即時性上，都更加有利於研究使用，並參照新聞可信度之調查，決定將具有較高信賴度形象的傳統報社發行之報紙，其內容經報社電子化統整發佈後，供一般社會大眾得以在該報社或新聞網站上瀏覽之報導，作為本次的研究對象，資料取得途徑則以各報社的電子資料庫為主。

至於調查的報紙媒體則是以發行量排行前三名的三家日本報社為主，分別是《讀賣新聞》、《朝日新聞》及《每日新聞》。³⁴發行量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足以反映閱讀人數的多寡，亦可解釋為對於社會的影響程度與一般民眾眼中的公信力，因此以發行量前三名作為基準，選擇上述三家媒體具有其意義存在。在報導期間的選擇上，關於媒體對加害者與被害者的形象描述，主要採用秋葉原事件發生後一週內（即 2008 年 6 月 9 日至 2008 年 6 月 15 日）的報導，直接觀察媒體如何在外界對於事件仍處於高度關注的時期，將事件的相關情報傳達給社會。之後則是根據與事件相關的重大議題（如檢方調查進度、法院審理過程、死刑問題、過去類似事件等），觀察該時間點當下的媒體報導內容。

此外，《讀賣新聞》、《朝日新聞》及《每日新聞》在政治與社會事件的報導上擁有各自的立場，如《讀賣新聞》在報導敘述方式上較為淺顯易懂，在政治立場上偏右派，遵從保守與體制，一般被認為報導立場更傾向自民黨。與《讀賣新聞》完全背道而馳的則是《朝日新聞》，在政治立場上偏左派，時有反政府的言論出現，關於這點在本論文第三章的第二節及第三節，探討檢方在偵辦案件上的策略與死刑議題時足以看見端倪，亦可以發現《朝日新聞》與《讀賣新聞》在報導立場上的差異。相較之下《每日新聞》的立場則較為曖昧，基本上屬於中間偏

³³ 總務省情報通信政策研究所，〈平成 27 年 情報通信メディアの利用時間と情報行動に関する調査〉，2016 年，取自 IICP 情報通信政策研究所網站：<http://www.soumu.go.jp/iicp/chousakenkyu/seika/houkoku-since2011.html>，2018/1/4 閱覽。

³⁴ 日本 ABC 協会「新聞発行社レポート 半期・普及率」2016 年 1 月～6 月平均，參照《2017 読売新聞グループメディアガイド》，2017，頁 11，取自：<https://adv.yomiuri.co.jp/yomiuri/download/PDF/mediakit/general/2017mediaguide/data.pdf>，2017/12/11 閱覽。

左派，但較少有意識強烈的特定報導立場。

除了媒體的選擇，秋葉原事件的犯罪類型也是本論文討論的重點。事實上各國在「隨機殺人」的定義上各有不同，以台灣為例，謝煜偉將「隨機殺人」定義為：「是隨機、無差別的挑選殺害對象，因此行為動機並不能歸因於感情、金錢糾紛或針對特定對象之復仇」³⁵，如日本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³⁶與其他恐怖攻擊事件等，這一類具有宗教、種族等意識的行為則不在「隨機殺人」的範疇內。在日本，「隨機殺人」又稱為「無差別殺人」，根據日本法務省法務總合研究所的研究報告指出，所謂的「無差別殺人」指的是：「基於難以辨明的動機，對於完全沒有必須抱持殺意的對立・敵對關係之被害者，抱持殺意並加以危害之事件」³⁷。日本警察廳則是將與「無差別殺人」類似概念的「道路惡魔」定義為：「在人可自由出入之場所並無明確動機之下，對不特定對象以凶器殺傷等加以危害之事件」。³⁸與「隨機殺人」相似的概念同樣也存在於美國，美國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將這類的犯案型態分為「縱慾殺人」（Spree Murder）與「連續殺人」（Serial Murder）。「縱慾殺人」指的是在無冷卻期的情況下，犯下複數以上的殺人罪，換言之，犯人是在同一個時間點與地點上犯案；而「連續殺人」則可能存在著冷卻期，犯人很有可能是在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內於複數的地點犯案³⁹，例如 1997 年發生於日本兵庫縣的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⁴⁰、1988 年到 1989 年間的東京・埼玉連續幼女誘拐殺人事件。

³⁵ 謝煜偉，〈鬼島生與死：人、人魔、殺人魔 (Life and Death in Taiwan: Humans, Human Monsters and Those Who Kill the Monsters)〉《「鬼島」生與死：2014 台灣國際廢死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Life and Death in Taiwan》演講稿，2014 年，取自：<http://www.taedp.org.tw/node/2769>，2017/6/14 閱覽。

³⁶ 發生於 1995 年 3 月 20 日上午東京地鐵列車上的沙林毒氣事件，由奧姆真理教策畫發動，造成 13 人死亡，超過 6000 人輕重傷，被稱為日本二戰結束後最嚴重的恐怖攻擊行動。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及執行任務的 5 位教徒雖已被判處死刑，但至今仍未執行。

³⁷ 筆者譯。日文原文為「分かりにくい動機に基づき、それまでに殺意を抱くような対立・敵対関係が全くなかった被害者に対して、殺意をもって危害を加えた事件」。參照法務総合研究所，〈研究部報告 50 無差別殺傷事犯に関する研究〉，2013 年，取自：http://www.mmo.go.jp/housouken/housouken03_00068.html，2017/5/26 閱覽。

³⁸ 筆者譯。日文原文為「人の自由に出入りできる場所において、確たる動機がなく通りすがりに不特定の者に対し、凶器を使用するなどして、殺傷等の危害を加える事件」。參照警察庁，〈平成 17 年の犯罪情勢〉，2006 年，取自：<http://www.npa.go.jp/toukei/seianki2/20060424.ppd>，2017/5/26 日閱覽。

³⁹ 參照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Serial Murder: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for Investigators〉，取自：<https://www.fbi.gov/>，2017/12/10 閱覽。

⁴⁰ 發生於 1997 年日本兵庫縣神戶市須磨區的連續兒童殺人事件，又稱「酒鬼薔薇聖斗事件」，犯案時年僅 14 歲的少年 A（因犯案時未成年，故並未公布其本名）連續殺害 5 名兒童，造成 2 人死亡 3 人受傷，甚至將其中一名遇害男童的頭部砍下，棄置在神戶一間中學校校門口。由於少年法的保護，少年 A 最後被移置到醫療少年院接受矯正教育，並於 2004 年假釋出院，此事件促使日本犯罪刑責的最低適用年齡從 16 歲降至 14 歲。2015 年以「元少年 A」的名義出版《絕歌》一書，自我剖析犯案前的精神狀態與犯案動機，以及被捕後所展開的生活，並且在書末向被害者家屬致歉與表達悔悟之意，但仍引發日本社會與被害者家屬的強烈譴責。

綜合以上各國對於「隨機殺人」或類似犯罪的定義，再考量媒體較常提出對照的幾起事件的型態，本論文將同時參照日本法務省法務總合研究所對於「無差別殺人」的定義，以及日本警察廳對於「道路惡魔」的定義，將兩者都歸類在本論文中「隨機殺人」的範圍內。

第四節 文獻回顧

有關隨機殺人的問題，台灣也曾透過調查分析的方式，從中找出隨機殺人的成因與對策。2017年由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提出之〈陌生者間（含隨機殺人）之犯罪特性與防治對策研究〉報告中，將全台八所監獄之受刑人以「被害人均屬陌生人且動機非為情財仇性者」為基準，歸納出「陌生人隨機殺人組」與其他殺人組（非隨機之殺人組），透過問卷調查殺人者與一般民眾（對照組）在人格特性上的差異。

調查結果顯示，陌生人隨機殺人組在自尊、暴力態度、憤世嫉俗、憤怒情緒、憂鬱、社交焦慮等六種人格特性上與一般民眾及其他殺人組無顯著差異，其中又比一般民眾具有更低的同理心，在反社會人格及孤獨感上卻是一樣的。⁴¹對於這樣的調查結果，該研究主張隨機殺人案件的發生率甚低，且其他風險特徵與一般殺人犯有許多共通之處，考慮到政策的成本效益，與其他殺人犯罪預防對策一併考量即可。⁴²由此可見，台灣現階段仍是將隨機殺人事件的發生歸因於個人因素的傾向較為強烈。

再回到本論文的研究中心，對於同樣為隨機殺人定義下的秋葉原事件，日本社會又是如何看待的？曾任法務省保護觀察官⁴³的日本福祉大學教授木村隆夫以加藤智大為中心，爬梳了其犯罪過程與成長背景，其中對於加藤的家庭教育有大篇幅的描述，並認為這是日後加藤在人格形成上的關鍵之一。木村隆夫在文章中指出，加藤將生活中所發生的問題歸咎於童年時母親的教育，始終不願承認錯誤，不斷在其著作《解》一書裡為自己辯解。由於不擅長表達自我意識，在遭遇到不利於自己的情況時直接以行動表達反抗與不滿的作為，更使得加藤被逼入絕

⁴¹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陌生者間（含隨機殺人）之犯罪特性與防治對策研究〉，2017年11月10日，頁210-212，國立臺北大學受委託研究，取自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資料庫：<https://www.tpi.moj.gov.tw/ct.asp?xitem=443906&ctNode=35602&mp=302>，2018/1/30 閱覽

⁴² 同上註，頁214。

⁴³ 日本保護觀察官的職責在於監督並指導犯罪者及非行少年，使其能順利回到原本的社會生活，同時促進犯罪預防的活動。除了必須通過國家公務員考試，也得通曉刑事司法、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及醫學等高度專門知識，並具備對於人與社會關係的正確判斷能力。參照法務省，〈保護觀察官になるには〉，取自：http://www.moj.go.jp/hogo1/soumu/hogo_hogo04-01.html，2018/1/30 日閱覽。

境⁴⁴。木村隆夫引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⁴⁵對照加藤的成長情形，認為母親的教育造成加藤在「社交需求」與「尊重需求」上未獲得滿足，連帶使得「自我實現需求」也遙不可及。⁴⁶

東京地方裁判所在一審判決時參考了加藤的說法，認定其主要的犯罪動機為「將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作為『手段』，對（網路留言板上）冒充自己身分的人進行心理上的攻擊」，並在判決書中提到，加藤在職場上遭受排擠，因為失去繼續活下去的位置而飽受孤獨，並且對於周遭感到不滿，母親的教育使其性格缺乏同理心，無法與他人建立深厚的信賴關係等背景，都可能是促使加藤在秋葉原事件中「爆發」的原因。⁴⁷對此木村隆夫提出更深層的看法，他以「雪人」的形成比喻加藤的情況，強調如此嚴重的犯罪性並非短時間內就能產生。從生長環境到不適切的教育，以及在社會中遭遇的種種不合理對待，使加藤的不滿與不安就像雪人一般，在不斷累積的過程中逐漸加深並成型，甚至藉由將自己投影在過去所發生的類似事件中，「學習」能一口氣消除不滿的方法，例如：隨機殺人。如果在這途中周遭的人給予適當的支援，或是加藤本人付出努力的話，就能縮小「雪人」的體積。⁴⁸

值得注意的是，木村隆夫列舉了 1997 年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及 2001 年池田小學隨機殺人事件等過去的案件進行比較，將其稱為「自爆自殺的犯罪」，言下之意就是因為自身遭遇所導致的厭世感，促使犯人想藉由國家之手（死刑）來達成自殺的最終目的。⁴⁹木村隆夫提出了四點看法，認為加藤與過往隨機殺人事件的犯人有著很大的不同，並非典型的「自爆自殺的犯罪」。其一是加藤並沒有強烈的要求法院判處自己死刑，其二是審判過程中加藤並未如其他犯人般採取逃避的態度（這裡木村隆夫使用了「真摯的態度」一詞形容加藤），其三是從加藤的日常言行來看並沒有顯著的反社會性，最後則是相較於其他犯人，加藤的犯行不算是具有縝密的計畫。

木村隆夫根據以上的四點判斷，加藤的犯行屬於臨時起意、並且是帶著迷惘所犯下的，甚至懷疑加藤所主張的「對（網路留言板上）冒充自己身分的人進行

⁴⁴ 木村隆夫，〈秋葉原無差別殺傷事件，加害者 K の育ちと犯罪過程の考察〉，《日本福祉大学子ども発達学論集》，6，（愛知：日本福祉大学子ども発達学部，2014），頁 73。

⁴⁵ 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哈羅德·馬斯洛於 1943 年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將人的基本需求分為五個階段，並以金字塔圖層呈現，從最下層開始分別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所屬與愛的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實現需求」。

⁴⁶ 木村隆夫，〈秋葉原無差別殺傷事件，加害者 K の育ちと犯罪過程の考察〉，《日本福祉大学子ども発達学論集》，6，（愛知：日本福祉大学子ども発達学部，2014），頁 72。

⁴⁷ 同上註，頁 76。

⁴⁸ 同上註，頁 77-78。

⁴⁹ 同上註，頁 80。

心理上的攻擊」只是為了迎合檢察官與法院，所做出的容易理解的「好孩子供詞」。此外他更認為秋葉原事件本該是單純的自殺事件，由於加藤對未來的迷惘與受到其他隨機殺人事件的觸發，再加上沒有獲得原本該有的勸阻（木村隆夫將加藤在網路留言板上的預告犯罪的行為視為期望被他人阻止的證明），才導致原本可以成功防範的秋葉原事件的發生。⁵⁰

儘管木村在文章最後提到，在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下為了不讓孩子落入失敗組之中，選擇嚴厲的教育方式的加藤父母同樣是新自由主義社會的犧牲者⁵¹，但文中對於加藤所身處的社會背景未有詳細的闡述，由於不適切的家庭教育與周遭的冷漠所養成的加藤，打從一開始就被視為「秋葉原事件的兇手」進行剖析，出現所有問題都圍繞在加藤身上的情形，將加藤視為個案並歸咎於個人因素的傾向較為明顯。然而回顧日本幾十年來，即使經過不斷檢討仍一再發生的隨機殺人事件來看，若將每一起隨機殺人事件都賦予特定的個人因素作為結論，便無法解釋隨機殺人事件重複發生於時代之中的原因，對此日本國內亦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因此，除了加害者本身的生活環境，其背後所存在的社會問題，以及媒體如何在事件發生後向社會傳遞事件的始末、影響社會的觀感，都是探討秋葉原事件時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第五節 論文的架構

首先在緒論說明本論文以秋葉原事件及媒體報導為研究主題之動機與目的，解釋台日雙邊的媒體現況與報導規範，作為研究隨機殺人事件之背景，並確立「隨機殺人」在本論文中之定義與選擇調查的媒體對象，同時回顧過去有關秋葉原事件與隨機殺人事件的文獻。第二章介紹秋葉原事件的背景與日本社會的應對，其中以第一、二節整理加害者加藤智大的人生經歷，以及事件發生前社會性的「位置」對加藤活在日本社會中的意義，第三節觀察日本社會在事件發生後對於公共安全的檢討，第四節則是探討日本各界對於秋葉原事件發生的原因與背後隱藏之社會問題的見解，歸納出加藤所處的時代與秋葉原事件的關聯性。

第三章以分析媒體報導為主軸，先以第一節整理媒體筆下的加害者及被害者形象，分析各家媒體報導中的秋葉原事件，再分別以第二、第三節關注各家媒體在精神鑑定及死刑議題上的報導走向，最後在第四節觀察媒體如何回顧歷年的隨機殺人事件，並提出與秋葉原事件之間的共通性。

⁵⁰ 同上註，頁 81-82。

⁵¹ 同上註，頁 84。

第四章則將焦點放回秋葉原事件的加害者身上，整理加藤對於外界評論的看法與反駁，並分析加藤的主張與社會之間的矛盾點，第二節再透過秋葉原事件與日本社會的現況，比較台灣對北捷事件的態度。第三節加強說明時代與隨機殺人之間的關聯性，以及面對隨機殺人事件發生的應有態度。最後綜合秋葉原事件及媒體報導的研究，探討媒體在秋葉原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與欲向社會傳遞之情報，並思考隨機殺人事件背後存在的時代性問題。

第二章 秋葉原事件與日本社會的應對

本章將以秋葉原事件的犯人加藤智大的背景為起頭，回顧他在家庭教育、求學過程、以及工作環境中與周遭的接觸情形，並對照加藤在著作裡對於自我性格的描述，探討加藤心中的「位置」具有什麼樣的社會性意義，以及秋葉原事件發生後，日本社會如何在公共安全及事件背後的社會因素上進行檢討。

第一節 加藤智大的背景

秋葉原事件被稱為日本犯罪史上同類型犯罪最慘一案，犯人加藤在法庭上表示，犯案動機是向網路留言板上冒充他身分與中傷毀謗他的人表達不滿。⁵²對加藤來說，網路留言板的存在像是「回歸真實自我的地方」⁵³，且是活在世上「重要的位置」⁵⁴，一切的現實只不過是「表面」，而電子留言版上的才是「真心話」⁵⁵。2011年1月25日，檢察官以「缺乏造成嚴重後果的自覺以及對他人苦痛的同理心，無法期待未來更生的可能性」⁵⁶為由，求處加藤死刑。儘管辯護律師主張加藤疑似患有精神疾病，並稱加藤母親近乎虐待的不當教育方式，使他成為無法與他人建立緊密關係的性格⁵⁷，但最終仍不被法官所採納，認定加藤犯案時具有完全刑事能力，維持死刑判決。2015年2月，東京最高裁判所判決死刑定讞，將加藤羈押於東京拘置所等待執行絞刑。

回顧加藤的成長背景，作為長男的他，1982年9月28日出生於青森縣，另有一個小他三歲的弟弟。加藤的弟弟高中時僅入學三個月就從學校退學，於秋葉原事件發生後化名「加藤優次」（下稱優次），將童年時的家庭生活情形與對兄長的印象投書到《週刊現代》。根據中島岳志的調查指出，加藤的父親於金融機關就職，母親亦為青森縣人，她自當地名門青森高校畢業後，因為沒能順利考上縣外的國立大學，對於高中畢業的學歷一直抱有自卑感，與加藤父親結婚後便辭掉工作當專職主婦。然而母親的這份自卑感卻轉嫁到加藤身上，在加藤還是小學低

⁵² 中島岳志，《秋葉原事件 加藤智大の軌跡》，（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13），頁16-17。

⁵³ 日文原文為「自分が自分に帰れる場所」。參照同上註，頁17。

⁵⁴ 日文原文為「大切な居場所」。參照同上註。

⁵⁵ 此處的「表面」與「真心話」為日文裡的「建前」（たてまえ）與「本音」（ほんね）。參照中島岳志，《秋葉原事件 加藤智大の軌跡》，（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13），頁21。

⁵⁶ 朝日新聞，〈秋葉原殺傷、被告に死刑求刑 檢察「まれに見る犯罪」〉，2011年1月26日朝刊，取自：<http://www.asahi.com/>，2017/12/11 閱覽。

⁵⁷ 朝日新聞，〈秋葉原殺傷、二審も死刑 「結果重大」と指摘 東京高裁〉，2012年9月13日朝刊，取自：<http://www.asahi.com/>，2017/12/11 閱覽。

年級生時，母親便為他設下了青森高校及北海道大學工學部的升學目標，對加藤的指導相對嚴苛。⁵⁸儘管加藤對於車子及現場操作較感興趣，最終仍依照母親的期望考進非第一志願的青森高校。⁵⁹

關於母親的教育方式，加藤在法庭上有過許多敘述。例如，年幼的加藤曾經惡作劇將母親準備晚餐時分配好的高麗菜絲集中到同一個盤子，母親見狀後竟憤怒地把加藤帶到二樓，將他的頭壓到窗邊作勢要推下去，而母親也在法庭上承認確有此事。⁶⁰加藤小學二年級時，被母親要求在洗澡時背誦九九乘法，只要背錯了就會被母親將頭埋進水裡。對此辯護律師曾向加藤詢問，母親當時的行為是否只是在開玩笑，但加藤表示：「直到我感到痛苦為止，一直將我的頭埋在水裡，並不是在開玩笑」。⁶¹諸如此類的事情不斷發生，無法忍耐母親體罰的加藤時常哭泣，母親為了讓加藤停止哭鬧，曾經製作貼紙卡，只要加藤一哭鬧就會貼上一個貼紙，集滿十個會再另外給予懲罰。母親曾在法庭上表示，自從搬家後加藤的父親時常因為下班後喝酒而變得脾氣暴躁，甚至晚歸或乾脆不回家，造成她對孩子管教上的情緒失控。

加藤回憶，母親發怒時從未告知原因，當辯護律師在法庭上詢問他為何沒有試著將自己的心情告訴母親時，加藤表示，如果抵抗了只會遭受更多的懲罰，有時母親甚至會作勢撥打警局的電話，使年幼的他誤以為一旦忤逆母親，就會被警察逮捕，只能一邊哭一邊道歉。⁶²母親發怒時從不說明理由的情形，之後更體現在學生時期的加藤身上，例如小學一年級時，加藤曾在集會上毆打隔壁的同學，其理由只是希望對方能排好隊伍。此後，加藤逐漸喪失以言語作為溝通橋樑，以及表達自我情緒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獨善的判斷與行動。關於這點，弟弟優次也曾在《週刊現代》的投書上描述過。⁶³

然而，母親的管教問題不僅是情緒上的失控及過度的懲罰方式，同樣也強烈介入加藤自我的自主性。例如禁止加藤進入棒球隊，要求加藤穿自己選的衣服，檢閱加藤的作業並要求修改，甚至是之後的升學方向，一切都有母親介入的影子。加藤在獄中撰寫的《東拘永夜抄》一書裡提到：「在家裡是痛苦的。活在母親絕對的支配之下，必須時時刻刻保持緊張與警戒。…。因為思考也很痛苦，於是我不會放棄回顧過去了。就只是抹殺掉『自己』，遵從母親的意向而已。」⁶⁴

⁵⁸ 中島岳志，《秋葉原事件 加藤智大の軌跡》，（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13），頁 45。

⁵⁹ 同上註，頁 61-62。

⁶⁰ 同上註，頁 32。

⁶¹ 同上註，頁 36-37。

⁶² 加藤智大，《東拘永夜抄》，（東京：批評社，2014），頁 15。

⁶³ 中島岳志，《秋葉原事件 加藤智大の軌跡》，（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13），頁 34-35。

⁶⁴ 加藤智大，《東拘永夜抄》，（東京：批評社，2014），頁 15。

學生時期加藤與同儕間的關係並不差，根據中島岳志的調查發現，加藤的朋友並不少，且朋友對加藤的印象皆為成績優秀、跑步速度很快的模範生。放學後，加藤時常與朋友聚集在一起打電動、聊漫畫等瑣事，但幾乎都是在朋友家裡集合，因為加藤的母親並不喜歡加藤把同學帶回家，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加藤高中畢業為止。中學時期，加藤曾有交往的女友，對象是同年級的女性，但是遭到母親以「對成績沒有好處」為由強烈反對，不僅將加藤抽屜裡女友送的信件翻出來貼在冰箱上，甚至威脅如果不停止交往就要讓他轉學，最終加藤被迫與女友分手。⁶⁵

漸漸的，加藤使用暴力的情況開始出現在學校及家中。中學二年級（在弟弟優次的記憶中是三年級），加藤將拳頭揮向了母親。晚餐時間，母親再次因為成績的事情責罵加藤，然而，加藤沉默的反應卻惹火了母親。面對母親的咆嘯，加藤先是不理睬的繼續吃晚餐，卻被母親捏臉頰、扯頭髮，當下選擇離席卻又遭到母親拿著掃把追打，就在那個瞬間，加藤徹底翻臉了。他朝著母親的左臉揮了一拳，眼鏡因此碎裂並割傷母親。當他朝著母親詢問「眼睛沒事吧？」的時候，又被母親以髒話責罵，聽到爭執聲下樓的優次日擊了母親一邊哭泣，一邊用手帕壓著臉的模樣，認為當時肯定是流血了。⁶⁶那是加藤唯一一次毆打母親，但他的暴力行為卻沒有因此而停止。優次曾在 2008 年 7 月 26 日的《週刊現代》上刊登加藤房間的照片，牆上還留有加藤搥牆時所留下的凹洞。優次提到，加藤也曾因為心情煩躁，徒手將學校的玻璃打破，滿手是血的回家。⁶⁷

加藤開始出現突發暴力行為的時期，正巧發生了震驚日本社會的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犯下慘案的少年 A 與加藤同樣是 1982 年出生，當時年僅十四歲。對此，加藤的母親曾向友人表示：「跟那孩子（加藤）兩人獨處很痛苦。一想到我兒子與『酒鬼薔薇聖斗』同年紀就覺得可怕。」⁶⁸

第二節 事件前的社會性「位置」

高中畢業後，加藤並沒有如母親的願報考北海道大學，而是進入了岐阜縣中日本自動車短期大學就讀，卻因獎學金的問題與父親產生嫌隙，最終失去設計汽車的熱情，在沒考到汽車維修員資格的情況下從短大畢業。⁶⁹回到仙台求職的加藤成為派遣公司的一員，也是在這個時候，加藤開始接觸網路留言板。之後，他

⁶⁵ 中島岳志，《秋葉原事件 加藤智大の軌跡》，（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13），頁 56。

⁶⁶ 同上註，頁 57-58。

⁶⁷ 同上註，頁 58。

⁶⁸ 《FRIDAY》2008 年 6 月 27 日號，參照中島岳志，《秋葉原事件 加藤智大の軌跡》，（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13），頁 58-59。

⁶⁹ 中島岳志，《秋葉原事件 加藤智大の軌跡》，（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13），頁 73-75。

居無定所的到日本各地工作，又因為與同事之間的衝突離開公司。加藤在著作《解》裡提到，當初辭職的主要原因是被公司某位正社員說了：「不過是什麼都不會的派遣工。派遣工就給我閉上嘴照著別人的指示安靜做事。」但他也在書中解釋，並不是單純討厭這句話才辭職的，而是為了要改正對方的想法，藉由辭職的方式帶給對方痛苦，好讓對方向自己道歉。⁷⁰辭職後輾轉來到愛知縣求職的加藤碰了一鼻子灰，儘管後來又被派遣到茨城縣工作，並在此同時開啟他熱衷於獨自前往秋葉原的興趣，但隨著對網路留言板的依賴度增加，身旁又沒有可以訴苦的友人，在與留言板的網友關係惡化後，感受到強烈孤獨感的他開始有了自殺的念頭。⁷¹

加藤一共嘗試過三次自殺，第一次他曾向友人及母親預告自殺，並計畫駕車直接衝撞對向的貨車，但由於駕駛上的失誤造成車輛撞上路邊的岩石，導致車輛故障不得不作罷。值得一提的是，加藤在自殺失敗後回到青森的老家，當時母親曾對於過往不適切的教養方式向加藤道歉⁷²。加藤在《解》中提到，雖然沒有原諒母親過去的作為，但母親確實為自己解決了借款的問題，且加藤也打算當作自己已經死過一次了，希望連同過去的事情一併當作沒發生過⁷³。然而事隔一個月，加藤又嘗試了第二次自殺，只不過這次仍舊以失敗收場。

最後一次自殺，加藤將身上所剩的錢買了張車票打算在跳軌自殺，卻在中央線的月台上聽見由於跳軌事故列車停駛的廣播，加藤只好回到車上發愣，之後因為停留的時間太久而被停車場管理員通報警方。許久未與人對話的加藤一邊哭一邊向到場的員警傾訴自殺的念頭，員警對他說「活下去總會有好事」，然而這句話聽在當時的加藤耳裡彷彿是在說：「（雖然我什麼都不會幫你，但是）活下去總會有好事（所以你就一個人再努力吧）」。⁷⁴絕望加藤將車子開出停車場時，身上沒有錢可以繳停車費，停車場的管理員卻告訴他年末前繳清即可，讓他決定重新又開始找工作。關於這件事加藤提到：「那個瞬間，我變得必須得活下去。必須遵守在年末之前把錢還清的約定。這並不是金錢的問題，而是為了願意信任我的停車場管理員，我是這麼想的。這樣的我，正因為有了那樣的約定，即使是孤獨的也絕對沒有被孤立。自殺什麼的，一瞬間在我腦中消失的無影無蹤。」⁷⁵

事實上加藤的自殺行為與他周圍的人們有著強烈的連動關係，例如他第二次嘗試自殺時，由於突然收到了來自兵庫縣友人的信件，上頭寫著「等你 20 歲的

⁷⁰ 加藤智大，《解》，（東京：批評社，2012），頁 20-21。

⁷¹ 中島岳志，《秋葉原事件 加藤智大の軌跡》，（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13），頁 82-94。

⁷² 木村隆夫，〈秋葉原無差別殺傷事件，加害者 K の育ちと犯罪過程の考察〉，《日本福祉大学子ども発達学論集》，6，（愛知：日本福祉大学子ども発達学部，2014），頁 74。

⁷³ 加藤智大，《解》，（東京：批評社，2012），頁 29。

⁷⁴ 括弧裡的字句為加藤自己所補充。參照同上註，頁 40-41。

⁷⁵ 同上註，頁 41。

時候再去找你玩」，原本計畫在半年後的生日當天自殺的加藤臨時改變了心意：「如果要來找我玩的話，我怎麼可以死呢。有了那個約定，兵庫的友人成為我與社會的接點，即使孤獨也不會是（從這個社會）被孤立的狀態。」⁷⁶加藤在《解》當中數次提到「孤獨」與「孤立」二詞，他可以忍受孤獨，卻對於被社會孤立（與社會毫無連接點）感到恐懼，而使他放棄自殺的關鍵則在於「約定」。加藤透過與他人的約定確立自己沒有被社會孤立的事實。這個觀念與中島岳志在書中所說的「位置」⁷⁷是相互呼應的。

所謂的「位置」指的是生活在日本社會中，一個屬於自己的歸處。比起工作職位、社會地位等有形的「位置」，這裡所指的「位置」更趨近於心靈上的寄託，也就是自我得以回歸的地方。這樣的「位置」並不只是能讓自己展現真實的自我，且是需要受到他人所肯定並認同的。對加藤來說孤獨是痛苦的，但如果被社會孤立並失去自己的「位置」，同時也就失去了活在世界上的意義。加藤在被捕後曾在法庭上供稱，犯案動機是為了報復在網路留言板上冒用並中傷他的人，由此可得知，對加藤來說網路留言板提供了他在現實生活中所失去的「位置」，然而最終連留言板上的「位置」也失去，促使他犯下秋葉原事件。

加藤在《解》裡提到，自己與網路留言板的關係無法單純以「依存」一個詞來解釋，而是透過網路留言板將「空白」填滿的使用方法出了問題。所謂的「空白」指的是遭受孤立的時間，而「孤立」則是指失去與社會之間的連接點，即「社會性的死」⁷⁸這件事。加藤又進一步解釋，「與社會之間的連接點」意指作為自己行動理由的對象⁷⁹，例如第二次自殺時的兵庫縣友人，以及第三次自殺時的停車場管理員，都是他與社會之間的連接點。他更在《解》一書裡自白⁸⁰：

寫到這裡我才發覺，果然，我的留言板的使用方法是有問題的。留言板本身並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使用方法。留言板頂多只是其中一個與社會之間的連結點，想用它來追蹤一切是錯的。曾經有好多次機會讓我遠離留言板，但是與必須死命努力來確保和社會之間的連接點這樣的現實不同，留言板輕鬆多了，這種依賴留言板的情形，與其說是依存，或許該說是中毒了。

⁷⁶ 同上註，頁 37。

⁷⁷ 日文原文為「居場所」（いばしょ）。參照中島岳志，《秋葉原事件 加藤智大の軌跡》，（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13），頁 17。

⁷⁸ 筆者譯，原文為「社会的な死」。參照加藤智大，《解》，（東京：批評社，2012），頁 12。

⁷⁹ 筆者譯，原文為「社会との接点とは、自分の行動の理由になる相手のことです」。參照同上註，頁 12。

⁸⁰ 同上註，頁 49-50。

儘管日本社會對於加藤的犯案動機有諸多猜測，但以加藤對自我的剖析來看，倘若當初能將自己順利從留言板抽離，秋葉原事件或許就不會發生。

第三節 事件後的公共安全檢討

事件的發生造成日本社會極大的衝擊，檢討公共安全問題的聲浪也自各界湧現。由於犯人加藤在犯案時使用雙面刃匕首作為攻擊武器，且輕易自店家購買取得，外界紛紛呼籲修改持有刀劍的規範。2009年1月，日本實施改正銃刀法，嚴格禁止持有具以下四項特徵之刀劍，分別為（1）附有刀柄（2）左右對稱的形狀（3）雙面刃（4）前端顯著銳利等，刀刃長度在5.5公分以上15公分未滿的刀劍皆在範圍內，即使是放置家中收藏同樣違法，販賣方面同樣受到管制，不法持有者將面臨3年以下徒刑或50萬日幣以下罰金。⁸¹根據《讀賣新聞》的報導，改正銃刀法實施後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包含被禁止持有的匕首在內，總計回收了8,635件，其中因個人興趣持有的件數就高達5,489件⁸²，改正法執行後也有不少件因違法持有而遭到逮捕的案例。⁸³

事件中作為犯案現場的秋葉原中央街道，因每逢假日及週末實施交通管制，禁止車輛通行，又被稱為行人徒步區。正如其名，行人徒步區原先的用意是讓行人可以放下對車輛的戒心，無須任何顧慮的悠閒漫步在街道上，然而在秋葉原事件中，由於馬路中央聚集大量人潮，且人群毫無任何防備心，成為該事件死傷慘重的原因之一。時任千代田區長石川雅己在事件發生後，向都公安委員會提出行人徒步區的中止訴求，並在記者會上表示：「必須稍微停下腳步，重新思考行人徒步區最初的意義。」⁸⁴在與警方及町內自治會等團體達成共識後，以「回到行人徒步區的施行原則與安全確保等原點重新檢討」為由，首次中止自1973年實施以來的行人徒步區。⁸⁵期間雖然多次討論重新開放，但直到事件發生三年後，才於2011年1月23日正式開放，且開放時間從原本的假日及星期日正午開始，改為僅星期日的下午1點開始，步行區間也比過往縮短約200公尺，路上表演及

⁸¹ 讀賣新聞，〈禁止刃物、県警が引き取り きょうから改正銃刀法施行〉，2009年1月5日東京朝刊，埼玉南29頁，2017/12/21 閱覽。

⁸² 讀賣新聞，〈「ダガーナイフ」駆け込み届け出〉，2009年7月23日東京夕刊，夕2社14頁，2017/12/21 閱覽。

⁸³ 讀賣新聞，〈ダガーナイフ所持容疑で逮捕 県内初〉，2009年7月13日西部朝刊，福岡29頁，2017/12/21 閱覽。

⁸⁴ 讀賣新聞，〈秋葉原ホコ天中止 街の安全、原点から検討 区長「少し歩み止める」〉，2008年6月13日東京朝刊，都民31頁，2017/12/21 閱覽。

⁸⁵ 同上註。

自行車同樣列在禁止項目內。⁸⁶

此外，預告犯罪同樣成為日本社會注目的焦點。加藤曾多次在網路留言板上預告犯案，其中又以 2008 年 6 月 8 日犯案當日的留言最為詳盡。事件發生後，《讀賣新聞》將加藤在犯案當日上午 5 點 21 分起，截至犯案前 20 分鐘的部分留言刊載在報導當中，其內容如下⁸⁷：

- 5 點 21 分「好睏」
- 5 點 34 分「頭好痛」
- 5 點 44 分「在途中被抓到是最糟糕的情況」
- 6 點 03 分「對大人來說曾經是評價很好的孩子 對大人來說」
- 6 點 03 分「朋友什麼的、交不到吧」
- 6 點 05 分「向全體發送後得到了回信 還被當作是成員之一 有點開心」
- 6 點 10 分「原本預定的街道正封鎖中 果然、一切都在妨礙我」

- 6 點 31 分「時間到了 該出門了」
- 7 點 30 分「雨下得好大 明明全都完美準備好了」
- 7 點 47 分「算了 即使規模有點小、在雨天動手吧」
- 9 點 48 分「進入神奈川休息片刻 到目前為止都還算順利吧」
- 10 點 53 分「大塞車 能在時間之前抵達嗎」
- 11 點 07 分「涉谷真糟糕」

- 11 點 45 分「抵達秋葉原」
- 11 點 45 分「今天是行人徒步區的日子吧？」
- 12 點 10 分「時間到了」

由留言內容可見，加藤不僅詳細註明預計犯案的地點，甚至連犯案前的移動情形及心理狀態都清楚描述，宛如媒體的實況轉播。《讀賣新聞》更在該篇報導中指出，案發前的 5 月 27 日，網路論壇 2ch⁸⁸上名為「秋葉原」的文章分類中曾經出現「6/5 之後絕對會發生事件，所以先把分類項目設立好」這樣一段留言，

⁸⁶ 每日新聞，〈秋葉原：歩行者天国、再開は 1 月 23 日 日曜のみ・時間短縮・区間縮小〉，2010 年 12 月 11 日東京地方版，2017/12/21 閱覽。

⁸⁷ 筆者譯。參照讀賣新聞，〈予告された無差別殺人 携帯サイトの監視困難〉，2008 年 6 月 10 日東京朝刊，三面 03 頁，2017/12/21 閱覽。

⁸⁸ 日本大型網路論壇「2channel」(2ちゃんねる)，簡稱「2ch」，屬於網路留言板的集合體，2017 年 10 月起改名為「5ch」，參照：<https://5ch.net/>。

警視廳已在 6 月 4 日接獲通報，要求附近的警察提高警覺⁸⁹，最終仍未能阻止事件發生。警視廳幹部曾向媒體透露，如果能在事件發生前掌握加藤在板上的留言，或許能阻止悲劇發生。⁹⁰

由於加藤的行為在網路上掀起模仿效應，對於預告犯罪留言的取締也更加嚴密，案發後短短兩週的時間內，日本國內總計舉發 17 件犯罪預告留言，其中有 12 人遭到逮捕，4 人函送檢方偵辦，1 人接受輔導。而在這 17 人當中，有 6 人尚未成年，年紀最小的則是年僅 13 歲的中學生。多數被捕的嫌犯向警方供稱，沒有預料到自身的行為會造成這麼大的騷動，對此警方仍採取嚴正的取締行動，並強調就算只是輕微的惡作劇，具體寫下犯罪預告仍會造成國民不安，警備也不得不加強維護安全，對社會造成的惡性影響形同犯罪。⁹¹除了警方全力防堵預告犯罪再次發生，民間也有稱為「予告.in」⁹²的網站，即時更新各大網路留言板及論壇上的犯罪預告，提供警方追查的方向，可見社會對於此類型犯罪的恐懼與重視。

第四節 事件背後的社會因素

秋葉原事件不僅推動法律的改正，提升對公共安全的重視，更促使日本社會開始檢討隨機殺人事件的發生與社會背景之間的關聯性。隨著媒體詳盡的報導加藤的成長背景與工作環境，對於加藤的犯案動機也導向了幾個較為明確的推論，如家庭教育、社會格差、勞動環境及人際關係等。家庭教育的問題如本章第一節所述，加藤的母親不僅對加藤採取極為嚴厲的管教，更剝奪了加藤作為人的自主性，這一點加藤的弟弟優次在《週刊現代》上的投稿也多次證實，但依照加藤學生時期的友人及師長描述，加藤也曾經是成績優異的「好孩子」，高中就讀的也是縣內升學名校。這樣的「好孩子」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導致他日後犯下如此嚴

⁸⁹ 讀賣新聞，〈予告された無差別殺人 携帯サイトの監視困難〉，2008 年 6 月 10 日東京朝刊，三面 03 頁，2017/12/21 閱覽。

⁹⁰ 同上註。

⁹¹ 產經新聞，〈秋葉原通り魔事件後、17 人を摘発・補導 警察庁「7 割は定職つかず」〉，2008 年 6 月 24 日，取自：<http://sankei.jp.msn.com:80/affairs/crime/080624/crm0806241950038-n1.htm>，2017/12/21 閱覽。

⁹² 由矢野さとの所架設的犯罪情報共享網站，藉由定期檢索 2ch、部落格等網站上預告犯罪的關鍵字，如：「犯行予告」、「殺人予告」、「殺します」、「殺す」、「爆破」、「通報」等，自動刊載在首頁上提供即時資訊，同時也接受網路使用者的通報。網站設置發想為 2008 年秋葉原事件發生後，日本總務相增田寛也提出，希望在隔年的預算中加入檢索預告犯罪的軟體開發費用，金額高達數億元，矢野看到相關報導後認為，透過網路的特性由他來進行開發，不但省時又不花任何經費，便花了兩個小時獨自一人完成網站架設。參照 ITmedia NEWS，〈犯行予告収集サイト「予告.in」公開 「0 億円、2 時間で作った」〉，2008 年 6 月 12 日，取自：<http://www.itmedia.co.jp/news/articles/0806/12/news036.html>，2017/12/22 閱覽。

重的慘案，是社會渴望解答的問題之一。

關於家庭教育對案件中的原本是「好孩子」的加害者所造成的影響，日本教育評論家尾木直樹提出了兩個關鍵的因素。其一，對於這些「好孩子」來說家庭並不是他們得以安心放鬆的歸處，倘若無法回應雙親的期待就沒辦法被愛，他們徹底被「好孩子」這樣強迫式的觀念所綁架。另一個原因則是過去父母如果遇到育兒上的煩惱，通常會尋求街訪鄰居或其他父母的意見，問題自然也能透過討論順利消除，但在今日的社會，父母時常選擇獨自面對問題，而同樣透過與同儕討論家裡的教育方式得以紓解情緒的孩子，也如同父母們的處理方式，選擇將不安埋進心底，一個人帶著焦躁的情緒過日子。如此一來，整個家庭彷彿一個高壓的太空艙，親子關係隨著彼此之間的矛盾而逐漸加壓，最終直接引爆。⁹³

日本自由作家佐久間真弓也主張親子關係與加藤的犯案有著一定程度的關聯性，認為不適切的養育會使孩子的自尊心低落，母親的過度干涉對加藤的人格形成造成不良影響，並且將這種不當的養育行為稱為「虐待」，容易使孩子出現反社會或是自殘、自殺等行為。佐久間真弓表示：「對孩子抱有期待是理所當然的，用嚴厲的話責罵、干預他們的行動，如果把這些都認定是不適切的養育來責備父母就太過頭了。問題在於『有沒有好好向孩子傳達愛』。…。自尊心低落與『反正我做什麼都不行』這種自我否定的情緒一旦產生，就容易自暴自棄。…。無法珍惜自己，當然也不可能去珍惜他人。」⁹⁴

然而在秋葉原事件當中，並不只是加害者的家庭教育這個環節出現問題，後續也牽扯出更多的社會因素。尾木直樹將秋葉原事件的發生歸咎於三個原因，分別是前述的家庭教育問題，第二是對於網路的依賴，最後則是毫無人權可言的勞動派遣。其中家庭教育的問題又可分為「錯誤的學習指導方法」、「異常的教養教育」以及「家庭關係（親子關係）的不正常」⁹⁵，但更令人在意的是尾木直樹提出的網路依賴與勞動派遣的問題。關於網路依賴的部分，如本章第二節所述，加藤也曾在著作中提起這個問題，認為自己對於網路留言板的錯誤使用方式造成了最終的結果。然而這其中的關鍵在於，加藤將網路留言板視為自己的「位置」，也是唯一能夠述說真心話的地方。如本章第二節所述，這所謂的「位置」對於生活在日本社會中是相當重要的概念，一旦失去這個「位置」，就會陷入孤獨的漩

⁹³ 尾木直樹，《「よい子」が人を殺す—なぜ「家庭内殺人」「無差別殺人」が続発するのか》，（東京：青灯社，2008），頁 132-133。

⁹⁴ 佐久間真弓，《マルトリートメント（不適切な養育）が自尊感情の低い子どもを生む》，2008年。本文收錄於洋泉社 MOOK《アキバ通り魔事件をどう読むか！？》，（東京：洋泉社，2008），頁 40-43。

⁹⁵ 尾木直樹，《「よい子」が人を殺す—なぜ「家庭内殺人」「無差別殺人」が続発するのか》，（東京：青灯社，2008），頁 168-175。

渦當中。即便加藤在現實生活中並非沒有朋友，但對於他所認定的能說真心話、能表現真實自我的網路留言板，得到板上網友們的認可就等於得到活著的「位置」，其意義遠勝於僅是做做表面功夫的現實。

比起上述兩個原因，勞動派遣的議題因為牽扯到整個勞動環境與格差社會的背景，其背後所隱含的社會問題更加龐大複雜。作為派遣勞工的加藤並沒有穩定收入及固定的住所，時常必須隨著公司的調派四處工作，而派遣勞工的身分更使得加藤遭遇不平等的對待，這樣的勞動環境不僅在物質生活上沒有保障，更對加藤在社會中的地位產生衝擊，而這也同樣是日本年輕世代所面臨的問題，事件發生後一度在網路上引發共鳴。

說到發生秋葉原事件的 2008 年，就讓人想起描述弱勢勞工對抗資本主義體制的小說《蟹工船》⁹⁶，在作者小林多喜二逝世 75 年後突然爆紅的事件。這本於 1953 年出版的昭和名作透過新潮文庫的再版，在爆紅後短短兩個月內就賣出了 30 萬冊，截至 2013 年在日本的銷售量早已突破 160 萬冊。而這本小說爆紅的關鍵就在於，內容描述了在嚴峻的勞動環境下勞工團體如何團結並起身反抗，與現下日本年輕世代對於勞動環境與格差社會的不滿相互呼應。《讀賣新聞》曾以「『蟹工船』悲哀的再注目 歷年銷量 5 倍再版 對格差社會的唉嘆…年輕世代的共鳴」為標題報導此事，根據統計高達八成的小說讀者是 10 歲後半到 40 歲後半年齡層之間的年輕人，日本書店更以「與現代的『貧困勞動階級』⁹⁷重疊，描述嚴酷勞動環境的名作在平成的『格差社會』大復活」為廣告標語大肆宣傳⁹⁸，「蟹工船」一詞也在當年入選日本流行語大賞，反映出加藤所身處的世代對於社會勞動環境的絕望與不滿。

事實上在日本社會裡，存在著所謂的「勝利組」與「失敗組」⁹⁹，擁有好的學歷、穩定的工作與薪水，甚至是在某個領域出人頭地、得到較高的社會地位，通常會被認定為勝利組；相較之下，像加藤這樣短期大學畢業、以派遣工作維生、沒有穩定的收入也沒有伴侶的人，在日本社會的眼光中就被歸類在失敗組。失敗組通常具有不擅與人溝通、性格灰暗且自信不足等刻板印象，其中也不乏過去曾是「好孩子」的人。如果說持續待在上流社會的「好孩子」，因為前述的高壓環境容易出現家庭內殺人的情形，反之無法順利進入上流社會、甚至未能得到

⁹⁶ 《蟹工船》發表於 1929 年經濟大蕭條時代，描述由報廢船改造的蟹工船進入堪察加半島領海捕蟹並加工做成罐頭，但由於不受航海法規範，亦不是登記合法的工廠，故無需遵守任何安全規範，同時規避勞動法令。在嚴峻又不人道的勞動環境下，監工不合理的奴役與剝削最終引起船上的勞工們起身反抗。

⁹⁷ 「working poor」，又可譯作「窮忙族」。

⁹⁸ 參照讀賣新聞，〈「蟹工船」悲しき再脚光 例年の売り上げ 5 倍で増刷へ 格差嘆き…若者共感〉，2008 年 5 月 2 日東京夕刊，夕一面 01 頁，2017/12/23 閱覽。

⁹⁹ 指日文中的「勝ち組」與「負け組」。

正式僱用的「好孩子」，在失去對家庭與工作場所的依附，並感受到孤獨與絕望的同時，就會陷入自暴自棄的深淵當中，犯下隨機殺人這類的犯罪也就不足為奇了，尾木直樹將這種現況稱為「格差時代中的新社會現象」。¹⁰⁰然而這其中的關鍵在於，從原本看似人生勝利組的道路上跌落到失敗組的過程，往往只是一瞬間的事情，可怕的是這一墜落就宛如溜滑梯一般，只有一路向下的份。

日本社會運動家湯淺誠在《反貧困：逃出溜滑梯的社會》一書裡描述了這樣的社會環境，更批判日本政府及整個社會對於當前的溜滑梯社會毫無作為，甚至將責任歸咎於跌下溜滑梯的人們。以日本的情況來說，所謂的社會保險包含為保障受雇者所設立的厚生年金、雇用保險、勞災保險等，以及為自營業業主和高齡者設立的國民年金、國民健康保險、照護保險等。湯淺誠認為這些制度看似相當完善，卻有著很大的漏洞，比方說在非正式雇用的情況下，儘管法律上規定即使是非正式員工，只要符合一定的條件就必須投保雇用保險，但仍有不少企業沒有替他們投保，使得他們的工作及未來沒有獲得應有的保障。¹⁰¹部分的派遣勞工及失業者不但不符合領取失業給付的條件，也沒有足夠的收入給付國民健康保險，因此一再拖欠，儼然已經掉出了社會保險的安全網。

湯淺誠強調，非正式雇用的勞工彷彿被排除在社會保險之外，即使面試也無法獲得正式錄用，登錄的派遣公司不給工作，想申請社會補助又被拒於門外，這些看似層層防護的安全網，對他們來說就像腳邊有個大洞，一不小心就會墜落，並且毫無阻攔的一路摔出好幾層安全網。¹⁰²不過是否能將日本的隨機殺人事件全歸咎於社會保險等問題，仍是值得存疑的一件事。事實上單就法規來看，日本政府對於非正式僱用並非毫無規範，對於無法繳納國民健保與失業等問題，同樣設有許多保障與救濟辦法，若說因為雇主沒有遵守規範，而進一步造成非正式雇用者跌出安全網外是能理解的，但將隨機殺人事件的發生歸咎於社會安全網的不健全則顯得有些牽強。

就日本的現況來看，失敗組所面對的生活及就業問題確實相當嚴峻，日本社會卻出現了要求這些人為自己負責的言論。例如日本人才派遣公司的社長奧谷禮子就曾在《東洋經濟週刊》的訪問裡語出驚人，她認為沒有一個經營者會叫員工做到過勞死，過勞死是屬於自我管理的問題。就跟拳擊手一樣，自己的健康狀態究竟如何應該自己管理好，如果身體真的吃不消就應該老實講出自己的想法，累

¹⁰⁰ 尾木直樹，《「よい子」が人を殺す—なぜ「家庭内殺人」「無差別殺人」が続発するのか》，（東京：青灯社，2008），頁 196-197。

¹⁰¹ 湯淺誠，《反貧困：逃出溜滑梯的社會》，蕭秋梅譯，（台北市：早安財經文化，2010），頁 48-55、頁 89。

¹⁰² 同上註。

了的話休假就好了，而不是怪罪公司和主管。¹⁰³當被追問到對於貧富差距的看法時，她做出了以下的見解¹⁰⁴：

不管是下流社會或什麼的，其實都是文字遊戲，是社會在縱容這種風氣。原本該是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挑戰、自己的失敗，全都用這些字眼模糊了焦點。我對這種風氣深感憂心，我們真的要提倡這種論調，建立一個縱容姑息的社會嗎？

當然，這樣的說法立刻引來日本社會很大的抨擊，認為她只站在企業管理者的立場恣意的評論了過勞死與格差社會這類嚴峻的社會問題，對實際狀況根本毫不知情。湯淺誠將奧谷的言論稱為典型的「人生自己負責論」，套入過勞死的例子來看，員工明明有「休假」這個選項可以選擇，卻選擇了「不休假」，那是因為員工自己太過軟弱、沒有做好自我管理，所以一切都是員工自己的責任，追究社會或企業、主管的責任根本是錯的。¹⁰⁵這樣的想法無論怎麼看都是有問題的，理所當然也遭受日本社會的批判，但「人生自己負責論」卻存在於社會中。

日本作家東浩紀把這種「自己負責」的社會現象形容為「遊戲性」的現代社會。當一個主體在接觸某個對象時，他被這個社會賦予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他的選擇與對象給予的反應都依照著明確的規則走。然而儘管清楚明白這套規則，為了「破關」到頭來還是得仰賴一些直覺和偶然，這給予人們一種「遊戲性」的感受，而現代社會完全就具有這樣的「遊戲性」。身處在這個認同個人自由的時代，人們不太會受到地緣或血緣的限制，各種成功的祕訣在網路上隨手可得，無論成為什麼樣的人都是被允許的，並擁有無限的選擇。但反過來說，如果到最後什麼都不是，那也得自己負起所有的責任。¹⁰⁶

這樣的社會環境與湯淺誠說的「人生自己負責論」是相互呼應的，既然社會都給了你無限的自由跟選擇權，最終還落到失敗組去，那就是你自己的問題，這等於是叫窮人自己去死。¹⁰⁷再回到隨機殺人的問題上，同樣的理論套用在社會對案件的看法是一致的，人們彷彿對著事件中的加害者喊到，別把社會的不平等當作隨機殺人的藉口，作為失敗組全是自己的責任，選擇自殺或殺人也是自己的責

¹⁰³ 同上註，頁 94-100。

¹⁰⁴ 翻譯參照同上註，頁 95。原文出自風間直樹，《雇用融解:これが新しい「日本型雇用」なのか》（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7）。

¹⁰⁵ 同上註，頁 96-97。

¹⁰⁶ 東浩紀，〈秋葉原事件と「ゲーム的」現実感覚〉，2008年。本文收錄於洋泉社 MOOK《アキバ通り魔事件をどう読むか！？》，（東京：洋泉社，2008），頁 58-61。

¹⁰⁷ 湯淺誠，《反貧困：逃出溜滑梯的社會》，蕭秋梅譯，（台北市：早安財經，2010），頁 85。

任，既然都是自己的責任，那就以死來謝罪吧。

第五節 小結

透過爬梳加藤智大的背景可以發現，秋葉原事件的發生無法指向單一的因素，從家庭教育再到工作環境，最終演變成對於網路留言板的依賴，都可能是造成加藤自覺失去社會性「位置」的原因，其中較受議論的是家庭功能的喪失與格差社會的問題。由於加藤父母管教相當嚴格，母親的處罰方式與近乎剝奪自主性的教育方式，被認為是造成加藤性格易怒的主因。至於格差社會下所暴露的社會安全網漏洞與派遣工問題則引發了年輕世代的共鳴，除了使 1929 年問世的小說《蟹工船》重新在 2008 年爆紅，「溜滑梯社會」與「人生自己負責論」的現象更反映出隨機殺人事件背後的社會問題。而日本政府也在秋葉原事件發生後，針對持有刀劍祭出了嚴格的限制，行人徒步區更封鎖長達將近 3 年的時間，可見日本社會對於公共安全的重視與檢討。

第三章 媒體筆下的秋葉原事件

本章統整《讀賣新聞》、《朝日新聞》及《每日新聞》對於秋葉原事件的報導，觀察三家媒體筆下的加害者及受害者形象，並針對事件中有關精神鑑定及死刑的議題，比較各家媒體報導時的立場。此外，也透過媒體的整理報導回顧歷年的隨機殺人事件，理解媒體如何將歷年事件與秋葉原事件連結。

第一節 報導中的加害者與受害者形象

由於媒體能在第一時間傳遞大量且詳盡的情報，秋葉原事件發生後，媒體筆下對於事件始末及人物的描述，成為影響社會輿論與日後案件研究的關鍵。然而原本該是中立且講求事實的報導，不知不覺中成為了替社會評斷是非、甚至主導事件發展的角色。東浩紀曾在投稿文章中提到媒體在秋葉原事件發生後，積極採訪他的情形。他認為自己既不是心理學家，也不是犯罪學家或社會學家，只是一個出版了內容抽象的著作的評論家，卻因為當初媒體將事件定調為「宅男」的問題，因此全都跑來採訪他¹⁰⁸：

他們（媒體）或許是期待我建構一個以秋葉原這個「趣都」¹⁰⁹為舞台，一位迷失在現實與虛構之間的宅男所犯下的新型犯罪之類的故事吧。記者們也一再地向我詢問秋葉原這個地方的特殊性，還有犯人選擇秋葉原犯案的理由。某個新聞主播還向我提出了嫌犯所使用的匕首是受到 RPG¹¹⁰的影響這種胡亂的假說。

當東浩紀告訴記者們事件的本質與遊戲和宅男無關時，部分媒體卻將他的意見從報導中刪除。由此可知媒體在進行採訪前，對於事件本身可能設定了某些報導方向的架構，倘若無法透過採訪等方式替這個架構背書，「故事」本身就失去了可看性，也很難再被創作下去。而在一個「故事」當中，最重要的就是角色的

¹⁰⁸ 東浩紀，〈秋葉原事件と「ゲーム的」現実感覚〉，2008年。本文收錄於洋泉社 MOOK《アキバ通り魔事件をどう読むか！？》，（東京：洋泉社，2008），頁58。

¹⁰⁹ 2003年森川嘉一郎曾出版《趣都の誕生 萌える都市アキハバラ》一書，分析秋葉原自1997年起藉由動漫、電玩、美少女、cosplay等「興趣」的力量，從過往的電器街變成宅男中心地（オタクのメッカ）的現象與背景，其中「趣都」一詞便是形容秋葉原。

¹¹⁰ 角色扮演遊戲（Role-playing game）。

確立，如同東浩紀所提到的「迷失在現實與虛構之間的宅男」¹¹¹，這樣的設定放在秋葉原事件的犯人加藤身上，對媒體來說或許再適合不過了。有鑑於這種情形的出現，探討媒體在報導中如何去描繪秋葉原事件裡加害者與被害者的形象顯得十分重要。

下方的表 1 將加藤的生活背景分為 (1) 家庭背景 (2) 求學過程 (3) 工作環境等三個項目，統整事件發生後的一週內 (即 2008 年 6 月 9 日至 2008 年 6 月 15 日)《讀賣新聞》、《朝日新聞》及《每日新聞》對於這三個部份的報導內容及使用字句，藉以觀察媒體塑造的加害者形象。

表 1 媒體對加害者的生活背景報導 (筆者製作)

	讀賣新聞	朝日新聞	每日新聞
家庭背景	父：任職金融機關 母／弟弟 (父母後來離婚)	父：(49 歲)任職縣內金融機關／母(53 歲)／弟弟	父：(49 歲)金融機構幹部／母：(53 歲)家庭主婦／弟弟：小加藤三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父母代替寫作文得獎 • 父母為了跟周圍的人炫耀，要求凡事完美 • 父母離婚後家庭變得分崩離析，失去可以回去的地方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母親非常嚴格，對母親有反抗 • 社區裡有名的對教育熱心的父母 • 與嚴厲的父母處得不好，離開老家後幾乎沒有回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鄰居聽見父親怒罵孩子 • 父母強迫念書 • 父母想對周圍的人炫耀而代替孩子寫作文 • 母親曾要求祖父母不要插手她的管教 • 對更加優秀的弟弟偏心
求學過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青森市立小學 • 青森市立中學 • 進入名門高校 • 岐阜縣內自動車短大畢業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縣內有名的升學校青森高校合格 • 高中三年級曾離家出走 • 縣外的自動車專門學校 • 高中時升學意欲薄弱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縣立青森高校 (名門) • 想親自設計汽車 • 大學考試落榜 • 自動車專門學校 • 畢業後想成為中學老師
工作環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派遣公司日研總業 • 靜岡縣自動車工廠 • 時薪 1300 日幣，月收入 30 萬日幣上下 • 曾找不到工作服大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人才派遣公司「日研總業」 • 關東自動車工業 • 時薪 1300 日幣 • 產品塗裝工作 • 勤務態度良好沒什麼問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東京都人才派遣公司 • 關東自動車工業東富士工廠 • 汽車塗裝工作 • 時薪 1300 日幣，月收入

¹¹¹ 東浩紀，〈秋葉原事件と「ゲーム的」現実感覚〉，2008 年。本文收錄於洋泉社 MOOK《アキバ通り魔事件をどう読むか！？》，(東京：洋泉社，2008)，頁 58。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因為車子借了很多錢 • 誤會被解雇 • 6 日無故缺席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曾因為沒有工作服大鬧 • 6 日無故缺席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約 20 萬日幣 • 誤會被解雇 • 6 日無故缺席
---------------------------------------------------------------------------------------------------	-----------------------------------------------------------------------------------	------------------------------------------------------------------------------------------------

資料來源：參照《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

2008 年 6 月 9 日至 6 月 15 日之報導內容統整。

綜合三家媒體的報導後可以發現，媒體對於加害者背景的描述十分詳盡，從加藤的家庭背景、求學過程，再到工作環境都有提及。首先在家庭背景的部分，三家媒體都報導了加藤的家庭組成與父親的職業，對於家庭教育則是引用街訪鄰居的證言，強調加藤家的管教嚴格，父母為了面子問題對加藤採取高壓式的教育方針。其中《讀賣新聞》在報導中提到了父母的離異使得加藤失去歸處，《每日新聞》則是引述鄰居的看法，提到他們曾聽過加藤父親怒罵孩子的聲音，父母對加藤與弟弟優次也有著差別待遇。求學方面，三家媒體都以縣內的升學名校來敘述加藤就讀的青森高校，但由於加藤升學意欲薄弱，更對汽車產生興趣，最後選擇就讀自動車短期大學，且未取的專業執照就畢業的情況，可以說是加藤從「勝利組」摔落「失敗組」的轉捩點。其中，《讀賣新聞》在報導中準確地使用了「短期大學」來描述加藤的最高學歷，事實上加藤確實就讀了位於日本岐阜縣的中日本自動車短期大學，但《朝日新聞》及《每日新聞》則將短期大學誤植為「專門學校」¹¹²，對於事實的查證上明顯有所疏漏，且由於專門學校畢業後並無法獲得學士學位，而是授予「專門士」的稱號，因此有影射加藤並未進入大學就讀、學歷不足的嫌疑。

工作環境的描述上有著很高的相似度，從登錄派遣公司再到汽車工廠工作，儘管數字稍有出入，三家媒體都強調了加藤的收入，特別是時薪 1300 日幣的部分。《讀賣新聞》及《朝日新聞》引述同僚的說法，提到加藤曾因為工作服的問題大鬧工廠，《讀賣新聞》與《每日新聞》則寫到同僚和主管認為加藤可能誤會自己要被裁員。另外，三家媒體都提到了秋葉原事件發生前兩天（2008 年 6 月 6 日）加藤無故缺席，影射他即將展開行動。從家庭背景、求學過程、工作環境三

¹¹² 日本在高中畢業後的升學選擇大略可分為普通大學、短期大學及專門學校，除了教育內容上的不同，在修業年限、入學管道、畢業學分數、學位名稱及畢業出路等各方面皆有不同。短期大學除了同樣教授普通大學的科目，同時也培養對於職業與實際生活有幫助的能力，一般修業年限為兩年（醫療相關科系為三年），入學管道與普通大學幾乎相同，畢業後可以得到「短期大學學士」的學位。專門學校則是著重在專門科目的教育上，與未來職業有緊密的連結性，重視畢業後成為職場即戰力的能力，修業年間從一至四年皆有，修業年限達兩年以上可獲得「專門士」的稱號，四年以上則可被稱為「高度專門士」。參照進路ナビ，〈大学・短期大学・専門学校の違いって？〉，取自：<http://shinronavi.com/column/diff/>，2018/2/2 閱覽

個項目來看，加藤從家教甚嚴的名校學生一路滑落到時薪 1300 日幣的派遣員工，其人生軌跡清楚可見。

下方的表 2 同樣整理了事件發生後一週內，上述三家媒體對於加藤的報導，並將對於加害者形象的描述分為（1）人格特質（2）犯案當時（3）案後發言及態度等三個項目進行區分。

表 2 媒體對加害者的形象描述（筆者製作）

	讀賣新聞	朝日新聞	每日新聞
人格特質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小學：個性開朗腳程快 中學：直到畢業成績都是前幾名，個性開朗會開玩笑，休息時間會跟同學聊遊戲 高中：成績中等，對汽車有興趣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老實不愛說話的正常人 認真有禮又溫柔的孩子 成績優秀 無法想像會犯案的正常人 對誰都一樣的態度，很好聊天 不像是會突然暴怒的類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從小就是好孩子 老實又優秀 個性並不陰沉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易怒、不容易接近的氛圍，但搭話之後發現意外的好聊 聽其他男同學說他包包裡放過刀子 內向、無法與人溝通，陷入孤立之中而犯罪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直躲在殼裡的氛圍 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殺人 沒什麼生活感的人 小學開始就很易怒 性格很難懂，不是與誰都能交朋友的類型 交不到朋友和女友 對社會有怨念 有自殺傾向 可能受到遊戲的影響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宅男 沒有朋友和女友 暴走性格 社會意識稀薄 有自殺傾向 對「不幸」異常固執
	刊載中學時期加藤在畢業冊上對自己的分析：沒耐性、固執、遲鈍、冒失		
犯案當時	刊載犯案前留言板發言	刊載犯案前留言板發言	刊載犯案前留言板發言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邊發出怪聲在 5 分鐘內用刀襲擊十多人 犯案地點是秋葉原是「宅男」聚集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使用一擊就能殺人的刀子 犯案前在附近待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故意選擇行人徒步區 犯案前在附近待機 砍人時露出笑容

案後發言 及態度	「厭倦這個世界」 「對自己的遭遇不滿」 「我有精神病」 「小時候被父母說『不需要你』受到很大的打擊，事情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就我的認知中，秋葉原的行人徒步區是人最多的地方」 「總之我想殺很多人」 「想讓大家了解我」 「擬定了殺人的計畫，但那之後的事沒考慮」	「為了殺人才來秋葉原」 「對世界厭倦了」 「對生活厭倦了」 「殺誰都可以」 「勝利組的人都去死」 「除了（犯案時）一開始的情況都不記得了」 「沒想過事件發生後會變得怎樣」 「只記的最初的那個人跟被我刺殺的警察，那之後的事都不記得了」 「沒有逃跑的打算」	「對生活厭倦了」 「殺誰都可以」 「沒有要說謊的意思」 「事件後半不記得了」 「中學時很幸福」 「無論是現實還是網路都是孤獨的。在網路上被無視了，為了讓那些網路上的人注意到我的存在，才決定做一件大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向警方表示做了對不起被害者的事 • 預告犯罪是希望有人阻止自己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對事件感到後悔，描述生平時眼裡泛淚 • 只有要小小的聲音就會被驚醒，無法好好入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對於案件感到後悔 • 向搜查員傾訴對自己境遇的不滿時流淚了

資料來源：參照《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

2008年6月9日至6月15日之報導內容統整。

報導中關於加藤人格特質的部分，大多參考加藤的鄰居、學生時期的朋友、師長及職場同事的說法，部分則是評論家、醫師或犯罪學者對他的評斷，因此正反面評價都有。《每日新聞》的報導中特別提到「宅男」這個詞，以及交不到朋友和女友，《朝日新聞》則是提到加藤的犯案可能受到了遊戲的影響。《讀賣新聞》採訪了加藤從小學一直到高中每個時期的同級生的意見，此外也引用加藤於中學時的畢業文集裡對自己的分析，認為自己是個沒有耐性、固執又冒失的人。¹¹³從媒體所報導的加藤的人格特質來看，除了頻繁提到不擅長人際關係與易怒之外，可以發現加藤並非與社會極端隔絕的類型，甚至直到高中為止都還被評論為個性開朗、成績優異的好孩子，工廠的同事也表示難以相信他會在秋葉原犯下如此嚴重的事件。但《每日新聞》所報導的「社會意識稀薄」、「對『不幸』異常的固執」，

¹¹³ 讀賣新聞，〈「ひねくれている」 秋葉原無差別殺傷の加藤容疑者、中学時代に自己分析〉，2008年6月9日東京夕刊，夕2社18頁，2017/12/26 閱覽。

以及《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提及的「對社會有怨念」、「陷入孤立之中而犯罪」等字句則多半來自評論家、醫師或犯罪學者等專門人士的見解，並非與加藤有過實際接觸的人。

除了加藤的背景，媒體也鉅細靡遺地描述了事件當時的經過與加藤的行動，從表 2 可以看到，三家媒體都在報導中刊載了加藤犯案前網路留言板上的留言。其中，《讀賣新聞》提到加藤僅用了 5 分鐘的時間就砍殺十多人，且一邊砍殺一邊發出怪叫，更在報導中將秋葉原形容為宅男的聚集地，並詳細介紹秋葉原從電器街轉型成動漫電玩等二次元文化中心的特徵；《朝日新聞》採訪了曾隸屬美國陸軍特種部隊的軍事作家拓植久慶，解說匕首的特徵與兇殘程度：「與軍用生存刀或菜刀不同，匕首的刀刃較細薄，沒什麼力氣的人也很好使用。因為刀鋒很難附著血跡，無論使用幾次都不會降低殺傷力。」¹¹⁴；《每日新聞》則是引用目擊者的證詞，描述加藤在砍殺路人時露出詭異的笑容。

此外，關於加藤被捕後的發言，三家媒體都提到加藤對於世界及生活的厭倦，並且「殺誰都可以」、「總之想殺很多人」才選擇在行人徒步區犯案，除了想讓人注意到他的存在，對於犯案後的逃跑計畫或下場也未曾思考過。綜合以上內容，先不論報導的真實性，以結果來說三家媒體都成功營造出加藤犯案時冷血又殘暴的形象。不過三家媒體也都在報導中提到，加藤在犯案後曾向警方表示悔意，且對於事件後半的情形已經不記得了，並沒有故意說謊的打算，甚至在描述自己的經歷時落淚，《讀賣新聞》則是首先報導了加藤對被害者的歉意。¹¹⁵

下方的表 3 則是統整上述三家媒體在事件發生後一週內，對於被害者的相關報導，在此將內容主要區分為（1）受害者簡歷（2）親友對被害者的描述（3）親友對事件的看法等三個項目，節錄部分被刊載在報導中的發言。

表 3 媒體對被害者的報導內容（筆者製作）

	讀賣新聞	朝日新聞	每日新聞
受害者簡歷	姓名／年齡／職業／家庭組成 • 刊載死者照片 • 前往秋葉原的原因 • 死亡原因	姓名／年齡／職業 • 刊載死者照片 • 前往秋葉原的原因 • 死亡原因	姓名／年齡／職業 • 前往秋葉原的原因 • 死亡原因

¹¹⁴ 朝日新聞，〈4人、一突きで失血死 容疑者、強い殺意 東京・秋葉原無差別殺傷〉，2008年6月10日夕刊，1 総合 001 頁，2017/12/26 閱覽。

¹¹⁵ 讀賣新聞〈無差別殺傷「車で多額の借金」加藤容疑者が同僚に話す リストラ不安も募る〉，2008年6月12日東京朝刊，社會 39 頁，2017/12/26 閱覽。

對被害者的 描述	(死者：21 歲女大生) 「會在合唱祭時成為領隊、個性開朗的人」 「她將來想從事企劃演唱會的工作，還那麼努力的參加就職活動」 「已經得到一個內定了，正在煩惱要不要去」	(死者：19 歲男大生) 「溫柔的孩子，因為是獨生子，因為寂寞所到朋友家住，周圍的人都很喜歡他」 「那麼老實的一個人」 「無論什麼事都會回答『好』然後幫忙做的單純正直的孩子」	(死者：21 歲女大生) 「受人喜愛的孩子」 「想用音樂讓人快樂」 「已經拿到公司的內定」 「剛踏出人生的第一步」 「最後一次見面時才談著工作的夢想」 「總是帶著笑容的人」
	(死者：74 歲牙醫) 「今年 4 月才退休」 「才說吃個午飯就回來」 「正義感很強的人」 「還有很多想做的事」 「一定是擔心著孩子跟孫子的事走的」	(死者：33 歲營養師) 「很會照顧年下的孩子，個性溫柔」 (死者：21 歲女大生) 「還有很多想做的事」 「她想從事將音樂推廣成更貼近人們藝術的工作」	(死者：74 歲牙醫) 「還有許多未完成的事」 「認真學習，重視患者，知識豐富說話有趣。在新人跟患者裡都很有人氣」 「退休後想盡情做喜歡的事度過餘生」 (死者：19 歲男大生) 「平時放學後也不會出門玩，過著嚴格的學校生活。是 6 年間一起努力過來的重要夥伴」 「真的是溫柔的好孩子」
	(死者：19 歲男大生) 「從來不缺課，總是認真查作業資料的好孩子」 「認真誠實的孩子，才說著『會加油的』而已…」	(死者：31 歲男性) 「他是個老實又認真的孩子」 「明明正要開始從事他有興趣的事情」	
親友對事件的看法	「不明就裡的這種死法，太讓人不甘心」	「因為太過震驚，無法接受採訪」	「事情太突然了非常不甘心，像做了場噩夢」
	「非常非常不甘心，像惡夢一樣，發生得太突然了，我兒子太可憐了」	「太突然了，非常非常的不甘心，像是做了惡夢，我兒子太可憐了」	「那麼溫柔又纖細的孩子，為什麼被捲入這樣的事件裡」
	「為什麼你死了？對不起沒能守護你」	「不能原諒把別人拖下水」	「現在非常的憔悴，晚上也無法入眠。請讓我們安靜的送走故人，請容許我們婉拒採訪」
	「為什麼要下這種毒手」	「希望這一切都是夢」	
	「有著將來的 19 歲年輕	「絕對不會原諒他」	

	人遭遇這樣的惡行而去世，讓人惋惜」	「很難過。希望社會不要再發生這種事」	「很難過。希望社會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
	「明明前幾天才笑著來拜訪，問我『過得好嗎？』而已」	「比爸爸先走是不孝的。明明說好只是去買東西馬上回來」	「就算生活再怎麼苦，也不能這樣理所當然的殺人。無法同情」
	「他明亮的未來就這樣一瞬間被奪走了。妻子每天在棉被裡哭泣。一次也好像再見他一次」	「我們全家因為這件事已經身心俱疲了」	「無法原諒他（加藤）說殺誰都可以」
		「大有前途的 19 年輕人就這樣走了，太不甘心了」	「對犯人感到強烈的憤怒。才 19 歲大有前途的生命就這樣被奪走，心痛得像是胸口要裂開」

資料來源：參照《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

2008 年 6 月 9 日至 6 月 15 日之報導內容統整。

關於事件受害者（特別是死者）媒體同樣花了相當多的篇幅報導，不僅是事件發生後對於受害者親友的採訪，之後的出殯及告別式也幾乎都以單篇報導的方式再次回顧每一位死者。參考表 3 的內容可以發現，三家媒體都詳述了死者的姓名、年齡及職業，也刊載了死者的照片。其中較具有造成受害者家屬二次傷害爭議的部分，在於三家媒體都以文字或照片詳盡的還原加藤行兇的過程，包含透過目擊者的證詞重述加藤以貨車或刀子殺害被害者的方式，受害者遇害當下的反應和等待救援的絕望，以及最終的死亡原因等。另一個媒體報導的重點則在於受害者生前的為人與親友對事件的反應。無論是《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或是《每日新聞》的報導，都著重在死者生前受人喜愛的性格、未完成的夢想，甚至是事發前一刻與親友的談話，並且藉由描述死者當日前往秋葉原的原因，以及家人對於故人逝去的錯愕與難以接受的反應，透露出死者無辜受牽連的無奈。此外，媒體大量引用親友對受害者的思念與對事件的看法，不僅傳遞悲痛無助的情緒，也擴散了對加害者加藤的恨意及不諒解。其中像是「惡夢」、「不甘心」、「絕不原諒」等字句不斷出現，無形中也加深了讀者對於事件的情緒感受。

對照媒體筆下的加害者與受害者，兩者的形象被建立得相當鮮明。在媒體所描繪的秋葉原事件當中，加害者就是個厭倦世界、易怒又冷血的殺人犯（儘管他過去可能是個優秀開朗又有禮的好孩子），受害者則是大有前途或仍有許多未完成的事、個性溫柔且受人喜愛、如今卻只是出門看場電影就被捲入事件的無辜受害者。當然，這樣的報導走向必然較能受到社會大眾接受，又或者說是人們期望

看到這樣的內容，媒體不過是順應這種需求寫出這樣的報導，但如果只是單憑媒體所建立的加害者及被害者形象來了解事件後續的發展與審判，讀者很容易陷入一種先入為主的成見中。

第二節 檢方在精神鑑定上的戰術與媒體關係

根據《讀賣新聞》的報導，加藤被捕後曾向檢調單位供稱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契機是「小時候曾被父母說過『不需要你』而大受打擊」，檢調單位為了確認加藤的責任能力是否出問題，向東京地裁申請鑑定留置¹¹⁶。由於加藤屬於計畫性犯罪，落網後始終冷靜地接受調查，檢調單位認為加藤應該沒有責任能力上的問題，但考量到加藤可能利用被捕後的供述、動機及犯行的異常性在庭上提起責任能力的爭論，因此傾向在起訴之前申請鑑定留置。¹¹⁷由於精神鑑定與司法判決的結果密不可分，更與社會如何看待事件及加害者有著緊密的關聯性，媒體在處理秋葉原事件中精神鑑定議題時的報導方式顯得格外重要。

2008年7月7日，東京地檢以調查嫌犯加藤犯案時的精神狀態為由，正式向東京地裁請求鑑定留置獲准，留置期間是到2008年10月6日為止的三個月。¹¹⁸不過相較於《朝日新聞》及《每日新聞》僅以300字不到的字數報導此事，《讀賣新聞》在鑑定留置請求獲准的隔日（2008年7月8日），以487字及1228字的篇幅刊登了兩篇有關精神鑑定的報導，一篇放在頭版，一篇放在社會版。頭版新聞先是敘述了有關鑑定留置請求獲准的事實，之後提出加藤在被捕後自稱患有精神疾病，以及檢調單位根據加藤為計畫性犯罪且應訊時態度冷靜等事項，認為他並沒有精神疾病¹¹⁹；社會版破千字的報導則附上兩張圖表，詳細的解釋檢方請求鑑定留置的背景及原因。

在報導中，《讀賣新聞》將檢方在起訴前提起精神鑑定的作法稱之為「戰術」，並將其內容分為三個段落說明，分別是「責任能力」、「裁判員制度」¹²⁰以及「苦澀的教訓」。責任能力的部分除了重述頭版刊載的內容，更引述了指揮搜查的警

¹¹⁶ 係指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因鑑定被告心神或身體之必要，將被告送入醫院或其他適當之處所予以留置實施鑑定之強制處分。參照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網頁，取自：<https://www.tph.moj.gov.tw/ct.asp?xitem=95985&ctNode=15447&mp=003>，2017/12/26 閱覽。

¹¹⁷ 讀賣新聞，〈秋葉原無差別殺傷 一刺し4人致命傷 容疑者の鑑定留置検討〉，2008年6月10日東京夕刊，夕一面01頁，2017/12/26 閱覽。

¹¹⁸ 讀賣新聞，〈秋葉原殺傷 加藤容疑者を3か月間、鑑定留置 東京地檢、責任能力確認へ〉，2008年7月8日東京朝刊，一面01頁，2017/12/26 閱覽。

¹¹⁹ 同上註。

¹²⁰ 日本的裁判員制度（さいばんいんせいど）指刑事審判中，由市民中選出的裁判員與法官共同審理案件的司法制度。該制度於2004年確立，2009年5月21日正式施行。

視廳幹部的看法，直指加藤：「對於自己所做的事情根本清楚的記在腦子裡，並且以此享受著現實感」¹²¹。關於裁判員制度，《讀賣新聞》在報導中提到正式的精神鑑定必須經過精神科醫師一次又一次的問診及觀察，光是一個病患的費用就要花費數百萬日幣。因此檢方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出現，認為加藤的精神狀態根本沒有任何問題，擔心一旦這次實施精神鑑定，往後的事件都必須跟進，這麼一來費用的花費將相當可觀，不過最終還是選擇實施精神鑑定的關鍵，被認為是與裁判員制度有很大的關係。根據報導，以往都是在開庭之後依照辯護方及檢方雙邊的要求進行好幾次的「鑑定大戰」，然而在裁判員制度正式執行後，過於冗長的審判過程將會造成裁判員的負擔，對判決可能出現不當的影響。報導中更引述了某位法務省幹部的看法：「在裁判員之度當中，以『後攻』的方式將難以提出證據，還是在搜查階段就把能做的事準備好。」¹²²

報導的最後以「苦澀的教訓」為題，重提了於 2006 年及 2007 年發生在東京涉谷區的兩起慘案，分別是「新宿・涉谷菁英分屍殺人事件」¹²³及「涉谷區短大生遺體切斷事件」¹²⁴。兩起案件的一審判決都在 2008 年的 4~5 月出爐，且都未在搜查階段實施正式精神鑑定，直到審判前的整理手續才由辯護方提出精神鑑定請求，結果被告被判定無責任能力。對此法務省的幹部表示：「如果在搜查階段拿到『具有責任能力』的鑑定結果，即使在審判前的整理手續被辯護方要求做精神鑑定，也可以主張已經掌握根據『沒有再次精神鑑定』的必要。」¹²⁵

以媒體的報導傾向來看，《讀賣新聞》將檢調單位對秋葉原事件調查的態度視為一種作戰，對手理所當然是事件的犯人加藤，又或者是加藤的辯護律師，而取得勝利的關鍵則是精神鑑定的結果。在《讀賣新聞》的報導中，代表著正義一方的檢調單位為了避免加藤藉由主張無責任能力脫罪，在考量裁判員制度等因素後研擬出一套取勝的戰術，同時強調過去曾有辯方利用精神鑑定結果脫罪的案例，成功塑造出加藤方同樣意圖利用精神鑑定脫罪的形象。然而《讀賣新聞》之所以

¹²¹ 讀賣新聞，〈秋葉原殺傷 加藤容疑者を鑑定留置 公判前、責任能力確定図る〉，2008 年 7 月 8 日東京朝刊，社會 39 頁，2017/12/26 閱覽。

¹²² 同上註。

¹²³ 日本稱為「新宿・渋谷エリートバラバラ殺人事件」，發生於 2006 年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18 日，分別在東京都的新宿區及涉谷區發現被切斷的遺體，經 DNA 比對後確定死者為同一男子。殺害男子的犯人為他的妻子，因不堪丈夫的施暴及強迫墮胎，飽受創傷症候群所苦的妻子將睡夢中的丈夫毆打致死，之後將遺體切斷分別棄置在不同處，最終被判處 15 年徒刑。

¹²⁴ 日本稱為「渋谷区短大生切斷遺体事件」，發生於 2007 年 1 月 3 日東京都涉谷區的殺人分屍事件。作為預備校生的次男（當時 21 歲）因為與短大生的妹妹（當時 20 歲）發生口角，趁著牙科醫生的父母及大學生的長男外出時，在家中以木刀毆打妹妹頭部並以毛巾勒脖致死，犯案後將死者的頭、手及腳部等各關節以鋸子分屍成 15 段，並藏在房間的袋子裡，最後被父母發現報案，經鑑定確認犯案時具有多重人格，最終被判處 12 年徒刑。

¹²⁵ 讀賣新聞，〈秋葉原殺傷 加藤容疑者を鑑定留置 公判前、責任能力確定図る〉，2008 年 7 月 8 日東京朝刊，社會 39 頁，2017/12/26 閱覽。

能夠寫出這樣的報導，檢調單位或相關人員的「配合演出」也是必要的。就如同報導裡寫到的「指揮搜查的警視廳幹部的看法」、「某位法務省幹部的看法」等字句，站在辦案人員（或某些具有特定立場的官員）的角度來看，為了打贏官司事前向媒體透露風聲，並藉由報導將情報傳遞到社會，使輿論在無形中替檢調單位聲援，甚至向法官施壓等，在精神鑑定的報導中，媒體與檢調單位之間的關係並非單向的，而是存在著相互利用、藉以達到目的的可能性存在。

第三節 死刑執行下的報導爭議

精神鑑定並不是秋葉原事件中唯一受到關注的議題，緊接而來的是死刑判決的可能性。2008年6月17日，也就是秋葉原事件發生後十日，日本法務省發表了1988年至1989年間東京・埼玉連續幼女誘拐殺人事件（下稱宮崎勤事件）的犯人宮崎勤，以及另外兩起案件的死刑犯於東京拘留所遭到死刑執行的消息。由於宮崎勤事件中犧牲的四名受害者皆為4~7歲的女童，在當時造成日本社會相當大的衝擊，甚至促使各界開始探討兒童性犯罪的問題及相關法律的修正，再加上死刑執行的時間正好在秋葉原事件發生不久後，因此遭到外界質疑死刑背後的動機是否為抑制隨機殺人事件的發生。

《朝日新聞》在6月17日的晚報中以總計超過四千字的兩篇報導回顧事件的過程，以及犯人宮崎勤在法庭上及拘留所內的談話內容。其中也提到宮崎勤的辯護律師田鎖麻衣子對於執行死刑的決定表達強烈抗議，她認為宮崎勤長期具有幻覺、幻聽等精神上的疾病，且正在拘留所裡接受精神治療，早在5月底就將相關的證明文件送交當時的法務大臣鳩山邦夫，請求不要執行死刑。¹²⁶與宮崎勤有數次會面及書信往來的月刊《創》的編輯長篠田博之提到，宮崎勤從被捕以來就一直堅持著殺害幼女的理由是「為了讓死去的祖父復活」，且直到2007年3月兩人最後一次會面為止都沒有改變這樣的想法，質疑宮崎勤根本對於自己犯下的罪與死刑定讞的事毫無認知，更批判以死刑來作為贖罪的機能是不全的，社會只是將宮崎勤這個人抹殺掉而已。¹²⁷

另外，與宮崎勤有過八次會面的東海學院大學教授長谷川博一也表示，宮崎勤始終都強調著自己的無罪，認為是眾人將他誤會成殘忍的人，因此對於事件及受害者遺族從未表達過悔意。對此長谷川博一提出了他的看法：「對一個根本不

¹²⁶ 朝日新聞，〈反省・謝罪ないまま「次は、自分の番だ」連続幼女殺人事件の宮崎死刑囚に刑執行〉，2008年6月17日夕刊，1社會15頁，2017/1/4閱覽。

¹²⁷ 同上註。

理解死刑意義的人執行死刑，作為處罰還有意義嗎？」¹²⁸報導的最後，《朝日新聞》使用了「秋葉原事件才剛發生，沒有任何意圖嗎？」作為小標題，質疑選在這樣的時間點執行死刑的用意。¹²⁹

除了各方對於執行死刑的意義有疑慮，《朝日新聞》也在報導中指出，這是時任法務大臣鳩山邦夫自 2007 年 8 月就任以來所簽署的第四次死刑執行命令，總計有 13 名死囚遭處死刑，為 1993 年以來法務大臣任內簽署最多的一人。從死刑定讞到執行為止的時間也從過去十年間的 8 年縮短為 2~3 年，且這一次正好是在國會閉會後才執行。面對各項質疑，鳩山邦夫強調：「本來就是為了實現正義」¹³⁰。6 月 18 日，《朝日新聞》再度以將近三千字的篇幅引述鳩山邦夫在記者會上「我是抱著自信與責任選擇了可以被執行（死刑）的人」¹³¹這樣的發言，對照宮崎勤的律師明明已經發送正在著手準備再審的信函，批評他簽署死刑執行命令太過草率，並且在社會版的報導裡敘述了宮崎勤事件與秋葉原事件的關聯性。

《朝日新聞》的編輯委員緒方健二指出，宮崎勤與秋葉原事件的加藤犯案時的年紀不但相近，也同樣沒有良好的人際關係，甚至誇耀自己的犯罪行為。此外，宮崎勤將犯罪聲明寄到報導機關的手法，與加藤在犯案前在網路留言板寫下犯罪預告的行為有著相同的概念，強調了宮崎勤事件與秋葉原事件的相似之處。¹³²

不過真正引發問題的報導是《朝日新聞》於 6 月 18 日社會專欄「素粒子」¹³³的論點。專欄裡《朝日新聞》將日本史上第一個獲得七冠王頭銜的將棋棋士羽生善治稱為「永世名人」，並在後句補上「又稱，將棋之神」的字句；而下方與其對照的則是簽署宮崎勤死刑執行命令的鳩山邦夫，並在評論裡寫著：「永世死刑執行人，鳩山法相。抬頭挺胸的『自信與責任』，間隔兩個月的許可簽署達成新紀錄。又稱，死亡之神¹³⁴。」¹³⁵接著 6 月 20 日《讀賣新聞》引述了鳩山邦夫在記者會上對於自己被《朝日新聞》專欄稱為「死亡之神」的看法：「我認為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對於這種輕率的文章我打從心底感到不滿。即使是死刑犯也是有

¹²⁸ 同上註。

¹²⁹ 同上註。

¹³⁰ 朝日新聞，〈反省・謝罪ないまま「宮崎死刑囚に刑執行 88 から 89 年、4 女兒殺害 鳩山法相、13 人に」〉，2008 年 6 月 17 日夕刊，1 綜合 1 頁，2017/1/4 閱覽。

¹³¹ 朝日新聞，〈反省・謝罪ないまま「死刑肅々、なお加速 鳩山法相、計 13 人 残虐性考慮「自信持ち選択」〉〉，2008 年 6 月 18 日朝刊，2 綜合 2 頁，2017/1/4 閱覽。

¹³² 朝日新聞，〈事件の土壌変わらず 連続幼女誘拐殺人事件の宮崎死刑囚、刑執行〉，2008 年 6 月 18 日朝刊，1 社會 35 頁，2017/1/4 閱覽。

¹³³ 「素粒子」(そりゅうし)為《朝日新聞》自 1921 年起的專欄「今日の問題」延續而來的社會諷刺專欄，自 1959 年開始連載至今，內容多半為《朝日新聞》自家對於時事的立場或見解。

¹³⁴ 「死亡之神」的日文表示為「死に神」，而非直接使用漢字的「死神」。由於《朝日新聞》之後在道歉文中解釋「死に神」並非單純是「死神」的意思，為了方便區隔，在本論文中將「死に神」譯為「死亡之神」。

¹³⁵ 朝日新聞，〈素粒子〉，2008 年 6 月 18 日夕刊，1 綜合 1 頁，2017/1/4 閱覽。

人權及人格的。(這樣的寫法)對於被執行死刑的人是一種褻瀆,也是污辱。」¹³⁶而《產經新聞》更是以「死刑執行被朝日新聞稱為『死亡之神』法相震怒『這是侮辱』」¹³⁷為標題報導此事,《每日新聞》也同樣在當日的報導中提到鳩山邦夫對《朝日新聞》用詞的不快。

經過其他媒體的報導,《朝日新聞》在短短一天之內收到了大約 1,800 封的抗議信件,對此《朝日新聞》在 6 月 21 日的「素粒子」上解釋並沒有中傷法務大臣鳩山邦夫的意圖,還提到「社會諷刺專欄愈來愈難做了」,對於其他媒體致電詢問則一概以「不予回應」回答¹³⁸。6 月 26 日《讀賣新聞》及《每日新聞》持續報導全國犯罪被害者之會抗議《朝日新聞》的「死亡之神」用詞,並將抗議文與公開質問信函寄到新聞社去,憤怒的表示:「期望並等待著死刑能盡早執行的被害者遺族也成了死亡之神,(因為你們的報導)第一次受到這般侮辱又心碎的苦痛。」¹³⁹

面對風暴愈滾愈大,《朝日新聞》在 6 月 30 日率先做出道歉,並在 7 月 2 日的報導中寫到:「當初沒有考慮到被害者遺族的心情,嚴肅的接受各方的批判,今後的報導將會記取教訓。」但同時也在同篇報導中解釋《朝日新聞》並沒有廢除死刑的立場,而是針對法務大臣鳩山邦夫上任後的言行做出短句的評論,如果令鳩山邦夫感覺受侮辱或中傷,覺得「很遺憾」。¹⁴⁰然而這樣的道歉內容並沒有獲得抗議者的認同,各家媒體更是持續報導《朝日新聞》收到愈來愈多被害者團體要求正面回應的抗議聲浪。整起風暴一直延燒到 8 月 2 日,《朝日新聞》以將近兩千字的篇幅公告已向全國犯罪被害者之會致歉並得到接受,且於報導中公開致歉全文,解釋引起爭議的 6 月 18 日專欄內的用詞。其中「永世死刑執行人」一詞是從將棋中的「永世名人」獲得靈感才藉以諷刺,而使用「死亡之神」一詞不是想表達死神的意思,而是用來比喻鳩山邦夫提出「死刑自動化」的言論,並非針對依照法律簽署死刑執行命令本身。此外,《朝日新聞》也說明了當初撰寫專欄的立場,表示死刑是能夠結束一個人生命的極端權力,因此希望在慎重執行的同時也能以慎重的態度看待,並在最後為沒有考慮到被害者遺族的心情致歉,

¹³⁶ 讀賣新聞,〈「死に神」表現に鳩山法相が抗議 朝日新聞の素粒子欄〉,2008 年 6 月 20 日東京夕刊,夕 2 社 18 頁,2017/1/4 閱覽。

¹³⁷ 產經新聞,〈死刑執行で朝日新聞“死に神”表現 法相激怒「侮辱だ」〉,2008 年 6 月 20 日大阪夕刊,社會面,2017/1/4 閱覽。

¹³⁸ 每日新聞,〈朝日新聞「死に神」報道:「素粒子」に抗議 1800 件 「風刺コラム難しい」〉,2008 年 6 月 22 日東京朝刊,社會面 29 頁,2017/1/4 閱覽。

¹³⁹ 讀賣新聞,〈「死に神」報道 犯罪被害者の会が朝日新聞に抗議〉,2008 年 6 月 26 日東京朝刊,3 社 37 頁,2017/1/4 閱覽。

¹⁴⁰ 朝日新聞,〈素粒子への批判、厳肅に受け止め 朝日新聞社、犯罪被害者の会に〉,2008 年 7 月 2 日朝刊,2 社會 38 頁,2017/1/4 閱覽。

撰稿者對於專欄的內容感到羞愧。¹⁴¹

自 8 月 2 日的公開道歉後，《讀賣新聞》及《每日新聞》等各家媒體也未再繼續報導此事，一場因死刑執行命令而引發的報導爭議看似落幕。不過從《朝日新聞》自事情發生後未向法務大臣鳩山邦夫直接道歉的態度，以及事後再版印刷也未將惹出爭議的 2008 年 6 月 18 日「素粒子」專欄內容修改或撤除，且公開的電子資料庫依舊能查到當時的文章來看，《朝日新聞》最終也只是屈就於輿論的壓力及其他媒體火上加油的報導，不得不做出道歉的姿態，但批判鳩山邦夫的立場始終沒有改變。當然以《朝日新聞》一直被認為偏左的政治立場來看，批判在安倍內閣下就任法務大臣的鳩山邦夫，其中固然隱含了一些政治因素，但由於牽扯到的議題與本論文的研究主題較無直接關係，在此就不多做討論。不過整起風暴中讓人感到可惜的是，《朝日新聞》最初將宮崎勤事件與秋葉原事件共同討論的做法在其他媒體的報導中較少看到，或許是一個提供社會檢討及反思隨機殺人問題的好機會，但最終流於文字戰爭的浪潮中，失去了深入討論的可能性。

第四節 媒體對類似案件的回顧

秋葉原事件雖然不是日本發生的第一起隨機殺人事件，卻因為死傷人數及事件背後所隱藏的社會問題太過龐大，引起日本各界的高度關注。許多媒體在報導中列舉歷年來的重大隨機殺人事件，不僅探究事件的共通性，更試圖解釋隨機殺人事件的發生原因。除了在上節提到的宮崎勤事件，其中較受注目的還有 1997 年的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下稱神戶事件）、1999 年的池袋隨機殺人事件¹⁴²（下稱池袋事件）、下關隨機殺人事件¹⁴³（下稱下關事件）、2001 年的大阪池田附屬小學隨機殺人事件（下稱附屬池田小事件），以及和秋葉原事件同樣發生在 2008 年的土浦連續殺傷事件¹⁴⁴。

¹⁴¹ 朝日新聞，〈朝日新聞社回答に「納得」素粒子問題で犯罪被害者の会〉，2008 年 8 月 2 日朝刊，3 社會 33 頁，2017/1/4 閱覽。

¹⁴² 1999 年 9 月 8 日發生於東京都豐島區東池袋的隨機殺人事件，日本稱為「池袋通り魔殺人事件」。當時年僅 23 歲的犯人造田博持菜刀與鐵鎚隨機襲擊路人，造成 2 人死亡 6 人受傷，2007 年 5 月死刑定讞。參照讀賣新聞，〈〔アキバ惨劇〕「池袋」「下関」通り魔事件 憤る遺族…なぜ繰り返されるのか〉，2008 年 6 月 14 日東京朝刊，2 社 38 頁，2017/12/30 閱覽。

¹⁴³ 1999 年 9 月 29 日發生於山口縣 JR 西日本下關站的隨機殺人事件，日本稱為「下関通り魔殺人事件」。犯人上部康明駕車衝入車站內輾壓 7 人後，持刀在樓梯間及月台上隨機砍殺乘客 8 人，造成 5 人死亡 10 人輕重傷，2008 年 7 月 11 日死刑定讞，2012 年 3 月 29 日執行。參照讀賣新聞，〈〔アキバ惨劇〕「池袋」「下関」通り魔事件 憤る遺族…なぜ繰り返されるのか〉，2008 年 6 月 14 日東京朝刊，2 社 38 頁，2017/12/30 閱覽。

¹⁴⁴ 2008 年 3 月 19 日及 23 日發生於茨城縣土浦市的隨機殺人事件。當時年僅 24 歲的犯人金川真大先是在 3 月 19 日以借腳踏車打氣筒為藉口殺害 72 歲被害人，後於 3 月 23 日手持菜刀及生存軍用刀砍殺員警及行人，造成 2 人死亡 7 人受傷。2010 年 1 月 5 日死刑定讞，2013 年 2 月 21

《讀賣新聞》就曾在秋葉原事件發生後報導 1999 年的池袋事件及下關事件，由於兩起事件的發生僅相差三週的時間，兩者的犯案動機皆與對社會的不滿有關，且下關事件的犯人上部康明曾供稱犯案前參考了池袋事件，因此在當時被認為是模仿犯罪。報導中《讀賣新聞》採訪了池袋事件及下關事件中的受害者遺族，曾在池袋事件中失去愛女的家屬認為，秋葉原事件簡直就是 9 年前池袋事件的翻版。雖然能夠明白無法取得正職的年輕人因為絕望進而對社會反感的過程，卻也向記者表示：「我一直想將女兒的死與防止同類型事件再度發生接上關係，然而卻是這種結果……當然我無法將他的犯行正當化，但是改變格差社會的現況，對於防範這類型的犯罪再次發生難道不是必要的嗎？」¹⁴⁵

而在下關事件中，犯人先是以汽車衝進車站輾壓路人再下車持刀砍殺的手法，與秋葉原事件極為相似，該事件的受害者遺族也提到，加藤或許是參考了當年的下關事件才犯下秋葉原事件，更難以接受的表示，為什麼這種荒謬的事情一再的發生。¹⁴⁶此外，《朝日新聞》也報導過下關事件中的犯人，其精神鑑定結果雖有輕微的被害妄想症，但犯案時並無精神耗弱等情形，故遭判處死刑定讞一事。《朝日新聞》在文章中引述了被告律師的辯護內容，指出辯方不斷在庭上主張秋葉原事件中的加藤在犯案前仍有良心上的掙扎，對照下關事件的犯人並沒有這些反應，意圖藉由秋葉原事件將案件導向當事人無責任能力的情形。¹⁴⁷

事實上關於格差社會及失業率造成年輕世代對社會不滿的問題，早在池袋事件及下關事件發生時就已經被提出來討論。當時《讀賣新聞》的編輯委員鶴岡憲一與高間道雅透過自家的報導指出，事件後的模仿效應可能使類似事件重複發生，呼籲政府必須從家庭、學校教育等方面研擬長期的防治對策。¹⁴⁸然而從《讀賣新聞》在秋葉原事件發生後的報導中可以看見，儘管過去受害者遺族與媒體一再呼籲重視隨機殺人事件背後的社會問題，同類型的案件仍然不斷發生。《朝日新聞》則是將秋葉原事件與下關事件在法庭上的辯護內容連接在一起，間接點出在隨機殺人事件中，加害者在犯案時的精神狀況與責任能力往往是左右判決的關鍵。

另一起受到社會注目的事件是 1997 年的神戶事件。犯人少年 A 曾在案後署

日執行。參照 J-CAST ニュース，〈土浦 8 人殺傷の通り魔犯 典型的秋葉原「ゲームオタ」だった〉，2008 年 3 月 24 日，取自：<https://www.j-cast.com/2008/03/24018172.html>，2017/12/30 閱覽。

¹⁴⁵ 讀賣新聞，〈[アキバ惨劇]「池袋」「下関」通り魔事件 憤る遺族…なぜ繰り返されるのか〉，2008 年 6 月 14 日東京朝刊，2 社 38 頁，2017/12/30 閱覽。

¹⁴⁶ 同上註。

¹⁴⁷ 朝日新聞，〈99 年下関駅無差別殺傷、上部被告の死刑確定へ〉，2008 年 7 月 11 日，取自：<http://www.asahi.com/special2/080609/TKY200807110239.html>，2017/12/30 閱覽。

¹⁴⁸ 讀賣新聞，〈相次ぐ通り魔事件の背景 「仕事の不調」が動機 不景気に潜む社会不安〉，1999 年 10 月 3 日東京朝刊，解説 13 頁，2017/12/30 閱覽。

名「SHOOLL KILL 學校殺手酒鬼薔薇」¹⁴⁹，將寫有以下內容的字條連同受害男童屍體的一部份棄置在中學前意圖挑釁警方，被稱為少年 A 的第一封挑戰書¹⁵⁰：

來吧遊戲要開始了
愚蠢的警察諸君試著來阻止我吧
殺人使我難以克制的愉悅
沒辦法太想看到人的死亡了
對骯髒的蔬菜執行死的制裁
對經年累月的仇恨進行流血的制裁

但由於當時媒體在報導挑戰書的內容時，誤將署名的「酒鬼薔薇」讀成「鬼薔薇」(おにばら)，隨後少年 A 又以「酒鬼薔薇聖斗」(さかきばらせいと) 的名義寄送第二封挑戰書至神戶新聞社，並且在信中寫到¹⁵¹：

…我對於自己的存在有著超越一般人的執著心，無法忍受有人將我的名字讀錯，汙穢我的存在。…。你們是打算抹殺我的存在吧？我在這場遊戲裡賭上了我的命，被抓到的話大概會被吊死吧。雖然我不會叫警察也賭上性命，但是帶著更多的憤怒和執念追捕我吧。今後你們再讀錯一次我的名字或是潑我冷水的話，我就在一週內捏壞三顆蔬菜。別以為我是個只會殺小孩子的幼稚犯罪者。

這是少年 A 在事件發生後與媒體的首次接觸，除了糾正名字的讀法、強調自己的存在之外，更利用媒體向警方及社會發聲。換句話說，在神戶事件當中媒體不僅是報導事件的存在，也變相成為了犯人與整個社會的溝通管道，這讓媒體在隨機殺人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變得更加重要，特別是在犯人尚未被逮捕的情況下，隨意的報導賭上的可能是下一個受害者的性命。

本論文第二章第一節中曾提到，加藤的母親在神戶事件發生時曾向友人表示，一想到自己就讀中學的兒子與犯人少年 A 同年紀就覺得可怕，而當時正好是加藤首次對母親施暴的時期。對於兒子的情緒失控體現在暴力行為上，神戶事件的發生就像是給予加藤母親的一個警訊，她當然也為此感到恐懼。由於秋葉原事件、

¹⁴⁹ 日文為「SHOOLL KILL 学校殺死の酒鬼薔薇」，少年 A 將「SCHOOL」一詞誤寫成「SHOOLL」。

¹⁵⁰ 字條內容為筆者譯，日文原文參照產經新聞大阪本社編輯局，《命の重さ取材して—神戸・児童連続殺傷事件》，(産経新聞ニュースサービス：1997)。

¹⁵¹ 同上註。

神戶事件，以及 2000 年發生的西鐵巴士劫持事件¹⁵²的犯人皆為 1982 年出生，因此又被稱為「易怒世代」¹⁵³、「酒鬼薔薇世代」或是「沒有理由的犯罪世代」¹⁵⁴，而這也成為秋葉原事件發生後，媒體再次提及神戶事件的主要原因。然而同樣出生於 1982 年的日本評論家古谷經衡無法認同這樣的說法，他認為 1982 年世代所犯下的事件，不過是隱藏在「時代的背景」這種單純產物背後的個人問題。人或許會受到時代所影響，但時代的氛圍並不會使人手握刀刃或發送重大犯罪的預告，真正有問題的應該是個人疾病及其他因素，又或者是家庭問題所引起的，就好比所謂時代誕生出殺人犯，那也只有有在戰爭的時候才會發生。古谷經衡更批判社會不過是懶得去關心加害者的個人歷程，才將事件發生的原因推到「時代的背景」上，並強調是人生活在時代之中，而不是人依存著時代生活。¹⁵⁵

由《產經新聞》所發行的《夕刊フジ》就曾在 2014 年的報導中探討「易怒世代」的特徵。新潟青陵大學研究所主修犯罪心理學的教授碓井真史認為，從統計數據來看 1982 年出生的犯罪者並沒有比較多，只是在殺人等凶惡犯罪的件數逐年下降的社會中，1982 年世代所犯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件碰巧比較多罷了。但他也在採訪中提到，1982 年世代的人出生在高度成長期結束後、豐饒且具有合理性的時代，這個時代出生的犯人的共通點在於原本都是優秀的人，當優秀的人無法適應被認為具有合理性的時代，遭受挫折時「不應該是這樣才對」的想法促使的犯罪的發生。¹⁵⁶

臨床心理師的矢幡洋則指出，不管哪個世代的人都具有犯罪傾向，但 1982 年世代的人確實被迫不得不去意識到神戶事件的存在，比方說西鐵巴士劫持事件的犯人就曾在日記裡提到，想要像神戶事件的少年 A 那樣引起大騷動。當這樣的

¹⁵² 發生於 2000 年 5 月 3 日佐賀縣佐賀市，又稱「新麥茶事件」（ネオむぎ茶事件），年僅 17 歲的少年先在 2ch 預告犯案後，持刀劫持一輛西鐵高速巴士，對車內的乘客大喊「你們要去的地方不是天神（西鐵天神巴士站），是地獄！」，並在抵達山口縣的山陽自動車道時砍殺乘客 3 人，造成 1 人死亡 2 人受傷。由於犯案當時尚未成年，事件發生後少年被送至醫療少年院，並於 2006 年退院。

¹⁵³ 日文為「キレル世代」，或稱作「易怒 17 歲」（キレル 17 歲）。參照《夕刊フジ》，〈「82 年はキレル世代」噂の真偽は？ 酒鬼薔薇聖斗、秋葉原無差別殺傷など…〉，2014 年 6 月 11 日，取自《夕刊フジ》網站「zakzak」：<http://www.zakzak.co.jp/society/domestic/news/20140611/dms1406111531016-n1.htm>，2017/12/28 閱覽。

¹⁵⁴ 日文為「理由なき犯罪世代」。參照產經新聞，〈【秋葉原通り魔事件】神戶事件やバス乗っ取りと同学年〉，2008 年 6 月 11 日，取自：<http://sankei.jp.msn.com/affairs/crime/080611/crm0806111720026-n1.htm>，2017/12/31 閱覽。

¹⁵⁵ 參照 zassi.net 網站定期連載之單元「古谷經衡のコンシューヨンダ! 第 12 回」中的文章〈片山被告と酒鬼薔薇世代 「1982 年生まれの闇」は本当か？〉，2008 年 5 月 27 日，取自：<http://archive.fo/d6Jtk#selection-2005.0-2005.29>，2017/12/31 閱覽。

¹⁵⁶ 夕刊フジ 〈「82 年はキレル世代」噂の真偽は？ 酒鬼薔薇聖斗、秋葉原無差別殺傷など…〉，2014 年 6 月 11 日，取自《夕刊フジ》網站「zakzak」：<http://www.zakzak.co.jp/society/domestic/news/20140611/dms1406111531016-n1.htm>，2017/12/28 閱覽。

人在犯罪時會對照過去發生的大事件，強化他們的自我表現慾望，並且可能為了超越過去的事件犯下更嚴重的案件。¹⁵⁷不過《夕刊フジ》也在報導的最後提到，連續在兩屆奧運奪下男子蛙式競泳冠軍的游泳選手北島康介正是 1982 年世代，其他也有許多有名的體育選手及演員在同個世代出生，更訪問了 1982 年出生的一般民眾，分享因為出生於「易怒時代」而被社會非議的經歷，算是替「易怒世代」的說法做了一次平衡報導。

相較於以上幾起事件，2001 年的附屬池田小事件是秋葉原事件發生後隔天，立刻被多家媒體以單篇報導的方式回顧的歷年事件，原因是這兩起隨機殺人事件相隔了 7 年的時間，再一次在 6 月 8 日這天重演，勾起了當年的事件關係人與社會的恐懼。《讀賣新聞》在報導中提到秋葉原事件發生的這天，大阪教育大學附屬池田小學正好在為 2001 年 6 月 8 日所發生的校內隨機砍殺事件舉行追悼會，該起事件造成 8 名兒童死亡、15 名師生輕重傷的慘劇，震驚了當時的日本社會。¹⁵⁸《朝日新聞》與《每日新聞》同樣以超過千字的報導篇幅，回顧當年的事件經過與追悼會當日的過程，並採訪了受害者及遺族對於秋葉原事件的想法。

根據《朝日新聞》的報導，一名在附屬池田小事件中失去女兒的母親表示，看見電視裡轉播著秋葉原事件現場救護車聚集及傷者倒地的畫面，使她回想起 7 年前學校內的慘況，並向記者表示：「希望（秋葉原事件）只是偶然發生在同一天，但選在人潮聚集的地點殺人，這種行為卻是相同的。看來成為安全的社會還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其他遺族則提到：「忌日這天我只想安靜地度過，但自己的身邊卻可能再次發生同樣的事，現在情緒難以平復。」¹⁵⁹而《每日新聞》也同樣在報導中提到了一名受害者遺族的心情：「附屬池田小事件使校園成為安全確保的對象之一，但這次卻只是在街上走動就被襲擊，到底該怎麼防範才好…」¹⁶⁰

透過《讀賣新聞》、《朝日新聞》及《每日新聞》的報導可以看見，秋葉原事件不僅讓附屬池田小事件的受害者遺族回想起 7 年前同日發生的慘案，更透露出遺族對於 7 年後仍未改善的社會安全問題的無力感。就如同 1999 年發生的池袋事件與下關事件的受害者遺族對秋葉原事件的看法，當類似的隨機殺人事件一再重演，不禁使遺族們懷疑起親人的犧牲究竟使這個社會學到了什麼教訓，對於社會安全更是失去信心。而媒體透過回顧類似的案件，除了試圖從中整理出隨機殺

¹⁵⁷ 同上註。

¹⁵⁸ 讀賣新聞，〈池田小事件から 7 年 追悼式典「祈りと誓いの集い」〉，2008 年 6 月 9 日東京夕刊，夕 2 社 18 頁，2018/1/2 閱覽。

¹⁵⁹ 朝日新聞，〈7 年前の光景、脳裏に 追悼の日、遺族ショック 附屬池田小・児童殺傷事件〉，2008 年 6 月 9 日夕刊，2 社會 16 頁，2018/1/2 閱覽。

¹⁶⁰ 每日新聞，〈大阪・池田小乱入殺傷：あの日から 7 年…祈りと誓いの集い〉，2008 年 6 月 9 日大阪夕刊，社會面 10 頁，2018/1/2 閱覽。

人事件的發生原因，更擔負了向相關單位甚至是整個日本社會傳遞警訊的任務，只要事件停止發生的那一天不到來，媒體也只能透過報導，一次又一次的呼籲社會重視眼前的問題。

第五節 小結

綜合本章的內容可以發現，媒體在報導秋葉原事件時有著固定的劇本架構，無論在加害者或是被害者的描寫上，都賦予了他們既定的角色形象，甚至將秋葉原建構成一個「適合隨機殺人事件」的大舞台，引導讀者進入「故事」當中，以受限的眼光窺視事件與加害者的樣貌。其中，《讀賣新聞》將火力集中在精神鑑定的議題上，透過報導與檢調單位建立了一個相互利用的關係。《朝日新聞》意圖將秋葉原事件與宮崎勤事件牽上關係，透過死刑執行命令的簽署問題抨擊時任的執政黨派。《每日新聞》的報導則是著重在創造加藤冷血古怪的宅男形象，例如描述他對於「不幸」異常執著、犯案時露出笑容等。在回顧歷年隨機殺人事件方面，三家媒體則有志一同的引述過去的受害者遺族對秋葉原事件的無奈與感慨，間接批評社會即使經歷這麼多起隨機殺人事件，仍然沒有找出適當的應對方式，彰顯媒體超越情報傳遞的價值。

第四章 隨機殺人的「時代性」

本章整理秋葉原事件的犯人加藤對於媒體報導及各界評論的看法，比較加藤的主張與外界的不同之處，同時分析隨機殺人事件中加害者與、媒體、檢調單位、以及社會之間的關係，最後回顧北捷事件，探討台灣社會對於隨機殺人事件的態度與日本的異同之處，以及時代與隨機殺人事件之間的關聯性，並思考面對隨機殺人事件來臨的應有態度。

第一節 加害者的主張與矛盾

秋葉原事件後，媒體與各界為加藤下了許多註解，犯罪原因從不適切的家庭教育再到整個格差社會的不平等待遇，無論是將責任推向個人或社會，在事件中都是作為一個旁觀者所下的結論，加害者的聲音卻鮮少被聽見，又或者「刻意不被聽見」。以加藤的情況來說，在東京拘留所等待的日子一共出版了三本著作，分別是 2012 年的《解》、2013 年的《解+ 秋葉原無差別殺傷事件の意味とそこから見えてくる真の事件対策》、以及 2014 年的《東拘永夜抄》。當然，這三本書的出版引來了日本社會很大的批判，被認為是藉由消費受害者與事件本身賺取版稅或是滿足成為社會焦點的慾望。秋葉原事件中為了照顧其他受害者而被加藤砍成重傷的湯淺洋就曾為此寫信給人在東京拘留所加藤，並在信中怒批：「你難道不該替被你殺害的人著想，將道歉寫進手記裡嗎？」然而卻沒有收到回音。¹⁶¹

神戶事件中的加害者少年 A 於 2015 年出版的事件筆記《絕歌》同樣受到強烈的抨擊，且由於少年 A 採用匿名的方式出版，更是難以得到社會大眾的接受，不僅各縣市圖書館及學校採取不購買的立場，部分書店甚至自律禁售《絕歌》一書，批評少年 A 在未取得受害者遺族同意的情況下強行出版著作，等同於二次傷害並踐踏受害者遺族的情感。儘管為少年 A 出版著作的太田出版社社長岡聰認為，該書有助於理解少年犯罪的背景並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但仍遭到外界痛批出版及言論自由不該毫無上限¹⁶²。對於《絕歌》的出版，神戶事件中的受害者遺族表示：「無法理解他為什麼要讓我們更痛苦。」並提到少年 A 及出版社皆未事前通知出版一事：「上個月讀了他（少年 A）寫的信，得到他對於事件結果的分析，

¹⁶¹ 讀賣新聞，〈秋葉原慘劇 消えぬ「なぜ」 事件 5 年 被害者「風化不安」〉，2013 年 6 月 8 日東京夕刊，夕社會 15 頁，2018/1/2 閱覽。

¹⁶² 讀賣新聞，〈神戶連続児童殺傷 元少年 A 手記 波紋 遺族「表現の自由 無制約でない」〉，2015 年 6 月 20 日大阪朝刊，社會 35 頁，2018/1/2 閱覽。

原本想著別再更進一步追究了，這本手記的出版卻踐踏了我們的心。」¹⁶³雖然受到各界的強烈批判，《絕歌》光是初版的 10 萬冊就迅速銷售一空，並且多次再版，少年 A 與出版社透過該書獲得的版稅難以估計。負責在台灣出版《絕歌》中譯本的時報文化主編李國祥透露，該書是台灣書市唯一一本隨機殺人犯的著作（已於 2016 年出版），並表示：「現象一直都在，並不是別開眼睛就能避免。台灣可能只有 5%不是站在看熱鬧及謾罵的角度，而是認真地想要了解，我們想要提供給這些願意思考的讀者閱讀。」¹⁶⁴

儘管手記本身備受道德上的爭議，讀者也可能是受到好奇心的驅使而藉由書籍窺探犯人的內心世界，但若嘗試將自己放在李國祥所說的「5%不是站在看熱鬧及謾罵的角度」去檢視這些著作，對於理解加害者在事件中的犯罪心理確實是有幫助的。以秋葉原事件為例，加藤就曾在《解》裡控訴媒體報導與事實的不符。加藤提到在被起訴後時常收到「收件人明明寫著我的名字，內容卻不像是寫給我的」這一類的信件，起初他並不明白其中的原因，直到看到媒體的報導才意會過來。¹⁶⁵加藤在書中引用了數篇《讀賣新聞》的報導，指出報導中使用了「供述」一詞，他認為所謂的「供述」指的是檢調單位在調查的過程中，將他的言論以接近的語意記錄下來，而非一字一句仔細還原他當時說過的話。換言之對加藤來說，所謂的「供述」只是檢調單位寫出來的文章，不是他真正的意思。加藤甚至認為自己的話被有心的省略過，即使在法庭上仍有再次閱讀當初「供述」內容的機會，但那份記錄也全是被重點整理過的東西，至於「重點」是什麼，當然是由整理記錄的人決定，根本稱不上是正確的情報，至於《讀賣新聞》報導的沒有朋友、對生活絕望到想死等等都不是事實。¹⁶⁶

《讀賣新聞》的報導中提到加藤曾向警方供稱「我是為了殺人而來到秋葉原」，對此加藤在《解》一書裡解釋，自己在接受調查時說的明明是「我並不是打算殺人」，卻被檢調單位曲解成「我沒有打算殺人」¹⁶⁷，接著就在警方的調查報告裡出現「（加藤）為了殺人去買刀子，為了殺人租借卡車，為了殺人開車碾壓路人，為了殺人拿刀刺殺路人」這樣的內容，最後被媒體引用後成了社會廣泛的說法。¹⁶⁸單從日文的語意上來判斷，加藤所提出的前句的「我並不是打算殺人」可能帶

¹⁶³ 讀賣新聞，〈神戶連続児童殺傷「元少年 A」手記出版〉，2015 年 6 月 10 日東京夕刊，夕 2 社 10 頁，2018/1/2 閱覽。

¹⁶⁴ 鄭郁萌，〈看看日本想想台灣 我們該怎麼讀殺人犯的書？（下）〉，2016 年 4 月 14 日於壹週刊網站刊載，取自：<http://www.nextmag.com.tw/realtimenews/news/37892363>，2018/1/6 閱覽

¹⁶⁵ 加藤智大，《解》，（東京：批評社，2012），頁 124-126。

¹⁶⁶ 同上註，頁 130-131。

¹⁶⁷ 原文中，加藤想表達的意思是「人を殺すつもりではなかった」而不是「人を殺すつもりはなかった」。參照加藤智大，《解》，（東京：批評社，2012），頁 125。

¹⁶⁸ 同上註。

有一絲悔意，後者的「我沒有打算殺人」則單純在否認「打算殺人」這個行為。儘管無法直接得知加藤的本意，但光是以「是否存在悔意」這點來看，在刑事判決上可能就有一定程度的落差，也能嗅出檢調單位背後的意圖。

不過撇開判決的考量來看，事實上早在之前加藤就強調過犯下秋葉原事件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殺人，而是透過事件向網路留言板的人表達不滿，然而經過媒體的報導後，內容卻與他所認定的事實愈來愈遙遠。除了《讀賣新聞》，加藤也在書中舉出幾則《朝日新聞》及《每日新聞》刊載在網路上的報導，批評媒體為了迎合檢方所認定的犯罪動機，將自己特定時期的事（例如工作時的情形）瘋狂寫在報導中，創造出某種犯人形象，甚至強調「目擊者」的存在，把從未發生過的事情說得好像事實一樣。關於自己認定的事實與媒體報導之間的矛盾，以及在書中引用《讀賣新聞》等報社在網路發布的報導的做法，加藤在《解》裡寫下這段話¹⁶⁹：

以結論來說，事件的報導幾乎都是假的。作為一個只是單方面接收報導訊息的一般人而言，我也是一邊想著「啊—原來是這樣啊」然後就這麼相信了。但是站在被報導方的立場，我卻看清了這種現實。…。我想應該有人抱持著網路是無法信任的這樣的偏見，但我使用的是報社在網路上發布的報導。這不過是送報生拿著紙本過來與透過迴路寄送資料的差距而已，報導的價值是不變的。

加藤不僅提出了報導的真實性問題，更點出傳統報社對於社會的影響程度，無論報導是以紙本或是網路的形式被發布，其報導的價值也不會改變。換句話說，只要該篇報導冠上了《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或是《每日新聞》等各家報社的名字，報導本身就具有影響力，讀者也很容易被這些報導說服。

除了抨擊媒體的報導，加藤也批評了警方的調查態度。加藤表示自己曾為了與調查的刑警爭論「我並不是打算殺人」這句話而不甘心的流下眼淚，但刑警只是不斷地反問「但你也沒有不打算殺人吧」，讓他忍不住詢問對方是不是被高層要求在調查報告裡寫下自己說了「我是為了殺人」這樣的話，結果被對方回覆「我們有所謂的搜查方針這種東西」。對此加藤認為即使再與對方堅持自己的說法也不會得到認同，因此只好放棄爭論，並在書裡寫到：「長田刑警（化名）也只是一顆棋子罷了。因為長田刑警的工作就是依照『搜查方針』製作供述報告書。我

¹⁶⁹ 同上註，頁 124。

也只能閉上嘴安靜的簽名蓋手印而已。」¹⁷⁰無論是對於學歷、容貌、交友關係、派遣工作或是失敗組的不滿，全都被巧妙的被警方與媒體創作出來，並歸納成自己的犯罪動機，加藤在《東拘永夜抄》裡寫到¹⁷¹：

總而言之，我又再一次被殺掉了。最初是在留言板上被冒用我身分的人抹殺存在，而這一次，我的存在在現實中也被抹殺了。當然肉體上我還是活著，但誰都不認識那樣的「我」。報導中的架空人物正以加藤智大的身分活著，而「我」卻社會性的死了。過去的朋友失去了「我」，我也真正的失去了他們。不，是被奪走了。

加藤又一次提到了「社會性的死」，這與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提到的社會性的「位置」是同樣的概念，但這一次對加藤來說，卻是在事件後被媒體及檢調單位抹殺「我」的存在。重新回到本節最初探討的議題，犯罪加害者的聲音往往不被社會聽見，這當中媒體與檢調單位顯然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檢調單位基於司法判決、社會觀感、穩定民心等立場，解釋隨機殺人事件的犯罪原因是他們首要的任務，而將加藤這一類的罪犯塑造成「就是想殺人」的形象是最快也最省事的方式。比起深入理解加害者真正的想法，對檢調單位來說盡快給予社會一個交代才是最重要的，而媒體的報導也跟隨著檢調單位的腳步將整起事件描繪成某種特定的模樣，這使得社會失去理解加害者的慾望，加害者的聲音就像是被整個社會屏障了一樣，只有符合期待的言論才會被聽見，其餘的社會並不想聽、更沒有聽的必要。

當然，加藤在書中的主張是否就等於「真相」，這一點只有加藤本人才知道，也必須看整個社會對於「真相」的定義究竟為何，但是單憑加藤的言論評斷檢調單位的調查與媒體的報導全是錯誤也並不適當。事實上回頭再看本論文中提到的加藤的言論，以及參考加藤在三本著作中的說法，可以發現其中充滿了矛盾。以犯案動機為例，加藤始終強調自己只是為了報復網路留言板的人才會隨機殺人，與家庭背景、派遣工作、人生失敗組之類的事情無關，社會替他冠上的動機全是不正確的；但於此同時，加藤不斷在書中回顧自己的成長環境、家庭教育問題，以及因為派遣工作在職場上遭到欺壓的過去。加藤一邊抱怨著找不到活在世上的「位置」，甚至旁人也都置身事外，因此只好選擇自殺或殺人，一邊又說對社會沒有不滿、不覺得自己是失敗組等等……加藤的三本著作全都圍繞著這些話題自

¹⁷⁰ 加藤智大，《東拘永夜抄》，（東京：批評社，2014），頁 144-145。

¹⁷¹ 同上註，頁 160-169。

相矛盾甚至原地打轉。

比起加藤在書中所主張的，出書是為了解釋事件真實的樣貌，加藤更像是為了向社會展現自己的「存在」而拚了命的找藉口，並控訴整個社會抹殺了他的「存在」。不論是事件前或事件後，加藤尋找自己社會性「位置」的旅程從來就沒有間斷過，甚至透過撰寫著作在混亂的意識當中尋找自我，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以「透明的存在」¹⁷²形容自己的少年 A 身上，對犯下隨機殺人事件的他們來說，控訴媒體的誤報與檢方失格的調查態度都不是重點，社會到底有沒有看見他們的「存在」才是他們真正在乎的。

第二節 從秋葉原事件看北捷事件

《讀賣新聞》曾在 2008 年 6 月 10 日的「編輯手帳」中這樣評論秋葉原事件：「如果厭倦的話就自己一個人從世界消失吧，連這種總是用來評論『嫌犯』的句子都懶得說。」¹⁷³這句話的意圖很明顯，卻也道盡了社會對於事件加害者的冷漠——如果你活不下去的話，就自己安靜地去死吧。本論文第二章的第四節曾經提到日本社會正瀰漫著「人生自己負責論」的風氣，而《讀賣新聞》編輯筆下的文字就完完全全體現了這句話。事實上理論本身並不足以畏懼，但是當日本發行量第一名的報社媒體已經可以毫無顧慮的寫出這樣的公開評論，意味著整個社會對於這種觀點的縱容與麻痺。日本早就追隨著歐美國家進入這種被孤獨擁抱的時代，對他們來說隨機殺人事件雖然可怕，但每年總會發生那麼幾件，只是程度輕重的差異罷了，實際上早已是見怪不怪。未料 2014 年的北捷事件領著台灣一腳踏進了這樣的時代，雖然以全球各地的情況來看，隨機殺人盛行的時代遲早都會來臨，但台灣社會是否已經準備好面對「鄭捷們」的到來，卻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觀察台灣媒體在北捷事件發生後的報導，最初與秋葉原事件一樣試圖從加害者的家庭背景與求學環境尋找犯案動機，然而當「家庭富裕」、「喜愛殺人電玩」等關鍵字出現後，媒體的報導走向徹底停滯在鄭捷一人身上。就這樣直到事件發生兩年後（2016 年）鄭捷遭處以死刑，隨機殺人事件也彷彿從未發生過般悄悄落幕。簽署鄭捷死刑執行命令的時任法務部長羅瑩雪在任內簽准過三次死刑命令（總計 12 名死刑犯），面對外界質疑死刑定讞後短短 18 天就執行槍決的做法，羅瑩雪認為北捷事件對社會治安的傷害太大，必須要有一個「特別的處理」，並

¹⁷² 産経新聞大阪本社編集局，《命の重さ取材して—神戸・児童連続殺傷事件》，（産経新聞ニュースサービス，1997）。

¹⁷³ 讀賣新聞，〈〔編集手帳〕惨劇で失われた「ときめきの 1 秒」〉，2008 年 6 月 10 日東京朝刊，一面 01 頁，2018/1/5 閱覽。

向媒體表示：「我們需要安定社會，讓大家回歸一個正確的觀念，這些事情是不容許的，也讓那些崇拜鄭捷、想效法的人有所警惕。」而針對為何沒有事先通知律師的問題，她則回答：「若事先通知的話，所有的死刑都不可能執行，因為相關的人可能會提出再審、非常上訴等等的動作，那會使得死刑的判決形同具文，變成沒有作用。」¹⁷⁴

由於死刑的人權議題牽扯到的道德及法律問題太過廣泛，因此不在本論文討論的範圍內，但整起風波讓人聯想起鳩山邦夫稱執行死刑是「實現正義」的言論，羅瑩雪的發言則代表著相信鄭捷的死可以換來「安定社會」的一方。作為處罰加害者與慰藉被害者遺族的手段來看，死刑存廢的問題確實可以從很多面向來探討，但若說死刑可以阻止隨機殺人事件的再發生，「經驗豐富」的日本早以用幾十年來的親身經歷完美打臉這樣的期待。光是從加藤與鄭捷在犯案後都沒有明顯逃跑意圖或事前擬訂計畫的情況來看，就可以知道對隨機殺人事件中的加害者來說，無論是遭到逮捕或是被判死刑他們都無所畏懼，甚至希望藉由死刑讓自己早點離開這個世界，除非是一時興起的模仿犯罪，否則死刑根本對與加藤和鄭捷同類型的潛在犯毫無威脅。

除了媒體的報導內容不夠全面，另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是北捷事件從發生到鄭捷遭到槍決只有兩年的時間，這兩年對被害者家屬來說或許漫長又難熬，但以研究的角度來看實在太短，更別說台灣媒體極力想將鄭捷塑造成一個從小熱愛血腥小說及電玩、滿腦子只想殺人的嗜血怪物，甚至直接在標題使用「殺人魔」¹⁷⁵、「惡魔」¹⁷⁶、「兇殘如豺狼」¹⁷⁷等字句形容鄭捷，激烈的用詞在日本媒體的報導中幾乎不曾看到。此外，台灣媒體在引述被害者家屬對於事件的看法時，選用「趕快判他死刑」、「浪費國家資源」、「很想揍鄭捷一頓」等仇恨性的言論¹⁷⁸，這也使得北捷事件的樣貌充斥著強烈的負面情緒，若想透過報導辨明北捷事件背後的因素又更加困難。

儘管日本對於秋葉原事件的分析並未阻止隨機殺人事件持續發生，但仍舊提供社會大眾反思家庭教育、公共安全、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的機會，或許在無形

¹⁷⁴ 胡守得，〈鄭捷槍決後 羅瑩雪說出真心話〉，蘋果日報，2016年5月11日，取自：<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60511/858512/>，2018/1/5 閱覽。

¹⁷⁵ 陳俊雄、葉德正，〈捷運殺人魔 鄭捷判4個死刑〉，中時電子報，2015年3月7日，取自：<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307000291-260102>，2018/1/5 閱覽。

¹⁷⁶ 蘋果日報，〈血洗捷運惡魔狂言 「殺完人 很舒坦」〉，2014年5月23日，取自：<https://tw.appledaily.com/finance/daily/20140523/35847882>，2018/1/5 閱覽。

¹⁷⁷ 蘋果日報，〈濫殺4人 兇殘如豺狼 鄭捷判4死刑〉，2015年3月4日，取自：<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50307/36423667>，2018/1/5 閱覽。

¹⁷⁸ 楊國文，〈高中班導出庭作證 鄭捷：抱歉讓老師失望了〉，自由時報，2015年8月19日，取自：<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907913>，2018/1/5 閱覽。

中已避免了許多原本可能發生的憾事。相較之下，才剛面臨隨機殺人時代到來的台灣社會，如果只是選擇關上門，默默地將媒體口中的「惡魔」處理掉，而非正視隨機殺人事件背後的社會因素，在一堆問題都還沒有搞清楚的情況下執行死刑，就真的變成「然後他就死掉了」的窘境了。

第三節 隨機殺人時代中的「我」

爬梳了秋葉原事件的背景與媒體報導，並且觀察了各界會對於事件的解釋後，重新回到日本社會最關注的一個問題：所以加害者的動機到底是什麼？如果將原因全都歸咎於加藤的家庭教育、工作環境與性格問題，就如同第一章文獻回顧時所提出的，打從一開始就將加藤視為「秋葉原事件的兇手」，為了迎合加藤是兇手的「結果」，才回頭將其人生經歷中各種可能的因素扣到頭上。如此一來社會便可以快速的為事件下註解，並且完美的轉身下台，事實上只是消極地等待下一個「加藤」的出現。秋葉原事件的發生確實無法與加藤個人的生活環境脫離關係，卻更不可忽視其背後的時代問題，否則檢討秋葉原事件的意義將會淪為「檢討加藤智大」本身。因此，本論文將秋葉原事件視為隨機殺人事件當中的重要指標，並提出了「時代性」的概念。

參考各國過去在隨機殺人事件上的歷史可以發現，比起為錢為情等因素的仇殺，並撇除精神異常等特殊情況，這種沒有實質目的與意義的隨機殺人都存在著一個共通性，也就是「自我展現」。而這種「自我展現」與加藤在事件後所提出的「孤立」與失去「位置」是可以一同討論的。換句話說，無論事件的引爆點是什麼，又是什麼樣的成長環境造就這些隨機殺人犯的性格，如果真的要賦予這些事件一個明確的犯案動機，最終都可以歸納到同一個點上：向社會證明自「我」的存在。

例如在秋葉原事件當中，加藤稱其犯案動機是對留言板上的網友進行心理上的攻擊，但與其說是報復遭到冒用身分這點，加藤更難以忍受的是「我」的存在遭到抹滅。本章第一節的最後也同樣提到，神戶事件的少年 A 以「透明的存在」形容自我的情形，其對應的動作便是投書到報社並向警方下戰帖，目的當然是要日本社會好好承認自己的存在。再回頭看看台灣的情況，鄭捷所謂的「想做一件大事」，不也是希望社會將目光放到自己身上嗎？

以這個方向來解釋本論文中所提及的隨機殺人事件又可以進一步發現，「預告犯罪」這件事也與證明自我的存在有關。就像是在事件發生前搖旗吶喊著「我要動手了，快看看我！」，比起上街殺了幾個人、最終的下場又是什麼，重點一

直都在於最初的那個「快看看我」。倘若因為「預告犯罪」而被提前阻止殺人計畫的進行又如何，至少社會已經看見「我」了。「向社會傳達不滿」這一類的理由其實也是在這樣的架構下產生的，否則加害者無須犯下隨機殺人案，只要將心中怨恨的那個主要對象去除就好，何必拖一大堆人下水，甚至引發社會的關注，因此重點依舊是在於「我」對社會感到不滿。這個「我」之於社會的關係，就必須從時代背景加以解釋。

隨機殺人事件並不只存在於日本，早在英國等歐洲國家就有數起案例，美國也同樣處在連續殺人與槍擊事件頻傳的時代，沒有明確目的性的隨機殺人近年來在先進國家屢屢發生。面對這樣的趨勢，日本作家吉田司曾以「象徵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自我中心殺人」¹⁷⁹為題評論秋葉原事件與時代的關聯性。吉田司認為，日本新自由主義改革使傳統的「共同體」社會被毀壞，人民陷入一種追求「自我責任」的世界，導致「共存共榮」、「平等分配」、「互助精神」等過去在公司或地區之間可以看到的體制消失，最後僅存的安全網只剩下具有血緣關係的「家人」。¹⁸⁰然而就結果來看，「家人」這個安全網並未能有效阻止事件的發生，況且一旦走出家庭外，眼前立刻得面對的就是「貧困勞動階級」¹⁸¹的社會。換言之，就像是「想出去也出不去的籠中鳥」¹⁸²，無論到哪裡都難以逃離這樣的社會結構。

吉田司將加藤在犯案後供稱的「殺誰都可以」視為犯罪者自我欺瞞的藉口，認為加藤真正想殺的應該是對他造成極大影響的父母，但是因為難以下手才選擇攻擊無辜的人群。¹⁸³而就秋葉原事件的發生情況來看，加藤確實是經過「選擇」才犯案的，並非真的「殺誰都可以」。例如加藤選擇了具有次文化屬性的奇幻王國（無防備都市=秋葉原行人徒步區）作為舞台，攻擊非武裝的弱者（獵物=徒步區的路人），而自己則是擁有貨車與匕首等武裝的強者（獵人=加藤），一切都符合了「弱肉強食」的規則。¹⁸⁴吉田司指出，正因為加藤將秋葉原行人徒步區視為現下日本最軟弱和平的羊群聚集地，所以才會選擇在該處犯案，然而當他被警方（有武裝的強者）包圍後又立刻投降，恢復原本失敗組（沒有武裝的弱者）的姿態，這種行為與其說是「殺誰都可以」，不如說是想向社會強調「故事的主角是

¹⁷⁹ 吉田司，〈新自由主義時代を象徴する自己チュー殺人〉，2008年。本文收錄於洋泉社 MOOK 《アキバ通り魔事件をどう読むか！？》，（東京：洋泉社，2008），頁 29-32。

¹⁸⁰ 同上註，頁 29。

¹⁸¹ 這裡與本論文第二章第四節中湯淺誠所提出的「working poor（窮忙族）」是同一個詞。

¹⁸² 日文原文為「出るに出不れぬ籠の鳥」。參照吉田司，〈新自由主義時代を象徴する自己チュー殺人〉，2008年。本文收錄於洋泉社 MOOK 《アキバ通り魔事件をどう読むか！？》，（東京：洋泉社，2008），頁 29。

¹⁸³ 同上註，頁 30。

¹⁸⁴ 同上註，頁 30。

我」。¹⁸⁵

上述的推論與本節一開始所提出的「我」的展現是相近的。在隨機殺人事件當中，對加害者來說故事的主角是「我」，其他人則隨便賦予一個「被殺的路人」的小角色就好。吉田司將這種類型稱為新自由主義與新古典派經濟學中典型的「合理性經濟人」¹⁸⁶，簡單來說這些加害者根本無法理解他人的痛苦，只想著如何達成個人的利益，因此隨機殺人的流行與這個以經濟學為主體的世界是互通的。此外吉田司也以神戶事件作為例子，舉出加害者少年 A 將自己形容為「透明的存在」這點，與加藤在網路留言板上表示希望自己的存在被認同的發言是相似的¹⁸⁷，而這也與本論文中多次提到的「位置」的概念不謀而合。

儘管吉田司在評論中提到，加藤的犯行是通過計算、以最小的投資達成最大利益的「合理性」的殺人，因此根本沒有接受精神鑑定的必要性¹⁸⁸，但觀察加藤在三本著作中矛盾又不斷重述部分事實的情況來看，加藤本身無論是在犯案前亦或犯案後，都仍處在尋找「位置」的混亂階段，要說是經過縝密計算的殺人行為或許仍有些牽強。不過光是從隨機殺人的發生出現「合理性」這點來看，確實如吉田司所說的，以新自由主義為風潮、象徵弱肉強食時代的殺人事件正在上演。¹⁸⁹倘若此時仍繼續將秋葉原事件的發生歸咎於個人因素，甚至只把加藤當作派遣勞動環境下的「犧牲者」，忽視整個時代與「我」之間的關聯性，將會在無形中喪失許多理解隨機殺人事件與加害者的機會。

第四節 小結

由本章的內容可以發現，不僅是媒體的報導內容，檢調單位針對隨機殺人事件加害者的調查也可能因為各種考量，導致調查報告的內容或是在記錄加害者的供述上與加害者的本意有出入。儘管無法單憑加害者的論述判定誰對誰錯，但為了避免只接受單一情報來源而造成對事件與加害者本身的偏見，聆聽加害者的聲音也是必要的。此外，觀察加藤出版的三本著作對事件的描述，再對照媒體的報導內容可以發現，比起闡述事件的經過，加藤似乎更想透過書籍的出版向社會展現自己的存在，同時在撰寫的過程中找到自我的定位，這同時也貫穿了在隨機殺人事件當中，加害者意圖透過犯罪來證明自「我」的存在。綜合以上對於秋葉原

¹⁸⁵ 同上註，頁 30。

¹⁸⁶ 日文原文為「合理的經濟人」。其中「經濟人」一詞源自拉丁語的「homo economicus」，在此意指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作為唯一的基準採取行動。參照同上註，頁 30-31。

¹⁸⁷ 同上註，頁 31。

¹⁸⁸ 同上註，頁 31。

¹⁸⁹ 同上註，頁 31-32。

事件在社會背景與媒體報導的研究，再回頭觀察台灣社會對於北捷事件的態度，可以看出台灣社會無論在媒體、政府、學界亦或社會大眾等方面，都尚未做好面對隨機殺人時代到來的準備，除了渲染與事件相關的敏感議題，媒體似乎也搜尋不到報導事件的背後意義與責任所在，是當前較令人憂心的問題。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論文以媒體報導為中心，研究秋葉原事件背後的社會性。透過爬梳秋葉原事件加害者的個人經歷與社會背景，並整理日本報紙發行量前三名的《讀賣新聞》、《朝日新聞》及《每日新聞》的報導內容，歸納出秋葉原事件在媒體筆下的模樣，以及媒體在事件發展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外，對照加藤智大的主張與外界對於秋葉原事件的評價及分析，觀察到日本社會在面對隨機殺人事件時所抱持的態度與應對方式。本論文將本次研究的發現分為（一）秋葉原事件中媒體的角色（二）個人因素 vs. 社會因素等兩個部分論述，最後提出面對隨機殺人事件時應有的態度。

一 秋葉原事件中媒體的角色

媒體在社會中不僅扮演著傳遞情報的角色，更擁有過濾資訊、決定社會關注何種議題、甚至以什麼樣的眼光關注的能力，因此媒體的報導往往會是決定整個社會走向的關鍵。在秋葉原事件當中可以看到，日本媒體建構了一個「適合發生隨機殺人事件」的舞台，並賦予加害者及受害者各自的角色形象，使事件的發展像是一則有頭有尾的「故事」，從嚴格的家庭教育造就加藤易怒的人格，再到短大畢業淪為派遣員工的生活，無端從過去的「好孩子」一路滑落到人生的「失敗組」，最後累積的怒火一次爆發造成了秋葉原的慘案。無論報導當中的論點與加藤智大本人的主張是否出現矛盾，或是透過檢調單位、親友及不知道是否真實存在的「目擊者」取得的情報是否百分之百正確，日本媒體在秋葉原事件中稱職地列舉出一切可能造就下一個「加藤智大」的因素，提供日本社會逐一去檢視與探討，這是台灣媒體目前仍做不到的。

當然，為了顧慮社會觀感及迎合大眾的口味，日本媒體在報導秋葉原事件時不乏一些「故事」的設定，如第二章第一節提到的加害者與被害者在報導中的形象，或是立場明顯的報導，如同章第二節及第三節精神鑑定與死刑議題，甚至扯入了一些政治色彩在其中，造成讀者在閱讀報導的過程中容易受到特定立場的影響，或無意間成為政府與媒體之間戰爭的圍觀者，進而失去深入了解隨機殺人事件的機會。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日本媒體在報導隨機殺人事件時，不僅僅是作為傳遞情報的角色，也透過訪問不同立場的學者或採用各方意見刊載於社論欄位，

帶領讀者從多元的角度看待秋葉原事件，展現了作為第四權的價值。

事實上媒體的報導很難完全秉持公正的立場，即使是一個小記者所寫下的一句話，都有可能導致整篇報導染上特定的色彩，更何況人們對於「公正」與「事實」的定義原本就曖昧不清，隨著群眾的聲音所變換的「風向」倒是比這些報導倫理上的規範更好掌握。這並不代表媒體可以捨棄公正報導與事實恣意妄為，但現今的社會已不再只是追求真相的時代，讀者更期望透過媒體的報導獲得剖析事件的觀點，確立自己面對事件時該有的態度，而非一味地被動接收訊息。

除了媒體與讀者之間的關係從單向變為雙向，在第二章第二節中也可以看到媒體與檢調單位為達目的相互利用的情形，這顯示著媒體身為社會與政府之間橋樑的重要性。例如在秋葉原事件中，檢方透過媒體向民眾展現嚴辦加藤的決心，輿論也透過媒體向政府及司法單位施壓，這種微妙的平衡關係一旦過於偏頗某一方，就會造成社會的失衡，因此在報導隨機殺人事件這類型的敏感議題時，仍然必須秉持謹慎的態度。

無論如何，日本媒體在秋葉原事件當中至少達成了將事情解釋清楚的任務，提供各界研究隨機殺人事件的基本素材，倘若能再更具同理心的處理加害者及受害者雙方的相關報導（特別是加害者家屬的部分），或許就能避免下一個加藤優次的悲劇。

二 個人因素 vs. 社會因素

日本社會對於秋葉原事件發生原因的探討，基本上可以分為「個人因素」及「社會因素」兩個部分。例如第三章第四節提到的派遣勞動、貧富差距、溜滑梯社會等，都是屬於社會因素的範疇。之所以會有隨機殺人事件的發生，是因為整個社會的環境造就了加藤智大這樣的人，無論是工作環境還是失能的社會安全網，由於無法從失敗組中翻身，感覺到被社會孤立的加藤為了向社會表達不滿，最終選擇上街殺人。相較之下個人因素就單純多了，或許是因為家庭教育的失敗造就了加藤易怒的性格，也或許是因為加藤沉浸於網路留言板，分不清現實與虛擬世界的差異，總而言之加藤作為一個「特例」，肯定在成長過程中的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因此成為了秋葉原事件的兇手。

主張個人因素的人最常提出的反論就是一全世界活得比你辛苦的大有人在，怎麼就只有你一個人上街殺人？如果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假設造就加藤易怒性格的關鍵在於家庭教育，那每個受父母嚴格管教的孩子都應該成為殺人犯，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此加藤的行為是由於他個人的因素產生的。然而，回顧加藤在

著作中的敘述，真的能毫無猶豫地將社會因素排除在外嗎？

本論文第四章的第一節曾經提過，加藤的言論是矛盾的，他一邊主張犯罪動機只是想報復網路留言板上的人，卻一邊在著作中回顧自己的成長環境與對職場的不滿。倘若真如本人所言，撰寫著作的目的是為了向社會大眾解釋事件的真相，加藤大可不必把自己的人生經歷寫進書中，以免社會繼續誤解。然而加藤不僅在書中鉅細靡遺的描述從小到大的生活，甚至不斷強調自己被社會孤立，比起解釋事件的真相，加藤反而藉由著作的出版向社會展現自己的存在。因此，秋葉原事件的發生並非由單一因素造成，而是在個人因素與社會因素並存的情況下發生，否則也不會以隨機殺人的型態一再出現於日本社會當中。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本論文第四章第三節所提到的時代與「我」之間的關聯性，同樣也可能是造成隨機殺人事件頻傳的原因，因此在研究社會因素時不可將討論限縮於派遣勞動、貧富差距等表面問題，必須考量整個時代背後所隱含的意義與價值觀。

此外，在檢討社會因素及個人因素的同時，責任歸屬的問題更是無時無刻圍繞著日本社會。探討隨機殺人事件的目的彷彿從原本的防範悲劇重演，變質為找個人來為這件事情負責的獵巫大會，光是從加害者父母下跪道歉的既定流程，再到多起加害者家屬自殺的事件，就能看出日本社會與媒體長久以來追究「責任」的弊病。日本文學家柄谷行人認為，這種現象與存在於日本社會中一種稱為「世間」的共同體概念有關，日本人也因為「世間」受到強烈的規範與約制¹⁹⁰，一旦子女犯了錯父母就該向社會負責，向這個「世間」負責。由於「世間」的概念牽扯到的層面太過廣泛，因此就不在本論文中詳加討論，但若套入秋葉原事件當中來看，加藤一直以來死命追求，最終仍然失去的那個被稱為「位置」的東西，就是「世間」下的產物。如同加藤不斷在著作中重複著自己被社會孤立、與社會之間沒有連接點等等的言論，那或許又是另一個只有正生活在「日本社會」中的「日本人」才能理解的道理吧。

加藤出版《解》之後，中島岳志曾在《秋葉原事件 加藤智大の軌跡》文庫版的後記中提到，人們必須再一次客觀地去面對自己所處的社會，存在著加藤所點出的問題，並且直視加藤這個人的存在¹⁹¹，否則問題永遠不會解決。這使人聯想到台灣社會在面對北捷事件時，消極而急於將鄭捷從社會中抹滅的態度，顯露出步上日本社會後塵的隱憂。而在秋葉原事件發生後，部分將加藤視為「英雄」的輿論也與台灣社會在北捷事件後的效應極為類似，體現出民眾在隨機殺人事件

¹⁹⁰ 柄谷行人，《倫理 21》，林暉鈞譯，（台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11），頁 38-46。

¹⁹¹ 中島岳志，《秋葉原事件 加藤智大の軌跡》，（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13），頁 271。

中所感受到的並非只有恐懼，同時也包含了相似於加藤及鄭捷對社會的不滿。這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隨機殺人出現在時代中的「合理性」，但這樣的「合理性」卻不該被加害者本身、甚至是整個社會認定為正常情形，否則隨機殺人事件的發生將會一路失速下去。中島岳志在後記的最後寫到¹⁹²：

創造出能讓加藤打從心底後悔著「我做錯了」、「如果能再活下去就好了」這樣的社會，是撰寫本書的我的職責。也只能這麼做了。加藤，為了讓你徹底感到後悔，我會繼續努力的。

要使身處在漩渦中央的加害者為自己的行為後悔或許有難度，但在一旁圍觀的人們卻能從中得到警惕。人們害怕在這些加害者身上看見自己的倒影，更害怕在同樣的社會背景下，自己會成為下一個加藤智大或鄭捷，於是反射性的抗拒理解加害者與時代之間的關係，任憑加害者被拖到某個看不見的角落，靜靜地等待從世界上消失的那一天到來。儘管這樣的現實醜陋到令人難以直視，面對事件的發生卻比逃避來得更更有作為，媒體對於隨機殺人事件的報導也應該具有警示社會的功能，否則一件「悲劇」的發生將會失去它存在的意義，並淪為單純的殺人事件，靜靜等待下一起能喚醒社會的「悲劇」再次發生。

第二節 今後的研究課題

本論文以報紙媒體為調查對象，觀察媒體筆下的秋葉原事件及背後的社會問題。然而以現代人的視聽習慣來說，具有高度即時性的網路媒體更受到網路使用者的喜愛，而影像新聞的報導方式也能使視聽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若將研究的範圍擴大到電視媒體及網路媒體，便能比較不同型態的媒體在報導上的差異，以及與社會的互動情形，使本研究的報導分析更加充實。

此外，在整理日本媒體與台灣媒體的報導時發現，日本社會鮮少透過研究國外的隨機殺人事件，探討日本國內的情形，媒體在回顧過去的隨機殺人事件時，也不會在報導中列舉國外的案例。相較之下台灣媒體不只在北捷事件發生後引述秋葉原事件與神戶事件，也將美國過去的隨機殺人事件列為參考對象。這種差異是否與日本社會自居的「日本文化」，以及看待國家內部與外部問題的民族思想有關，也是值得探究的方向之一。

¹⁹² 同上註，頁 271。

參考資料

1 專書

(1) 中文（含中文譯本）

Alain de Botton,《新聞的騷動：狄波頓的深入報導與慰藉》，陳信宏譯，（台北市：先覺，2014）

James Glen Stovall,《網路新聞學：新媒體的應用實務與展望》，楊慧娟譯，（台北市：五南，2006）

Janet Malcolm,《新聞記者與謀殺犯：當記者成為作者》，林宗憲譯，（台北市：五南，2014）

Samuel G. Freedman,《給年輕記者的信》，梁岩岩、王星橋譯，（台北市：五南，2010）

柄谷行人,《倫理 21》，林暉鈞譯，（台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11）

陳萬達,《新聞採訪與編輯—理論與實務》，（新北市：威仕曼文化，2008）

湯淺誠,《反貧困：逃出溜滑梯的社會》，蕭秋梅譯，（台北市：早安財經，2010）

(2) 日文

淺野健一,《犯罪報道の犯罪》，（東京：講談社，1984）

尾木直樹,《「よい子」が人を殺す—なぜ「家庭内殺人」「無差別殺人」が続発するのか》，（東京：青灯社，2008）

小林多喜二,《蟹工船・党生活者》，（東京：新潮社，1954）

風間直樹,《雇用融解：これが新しい「日本型雇用」なのか》，（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7）

加藤智大,《解》，（東京：批評社，2012）

加藤智大,《解+ 秋葉原無差別殺傷事件の意味とそこから見えてくる真の事件対策》，（東京：批評社，2013）

加藤智大,《東拘永夜抄》，（東京：批評社，2014）

柄谷行人,《倫理 21》，（東京：平凡社，2003）

産経新聞大阪本社編集部,《命の重さ取材して—神戸・児童連続殺傷事件》，（産経新聞ニュースサービス，1997）

佐野眞一,《クラッシュ風景が倒れる、人が砕ける》，（東京：新潮社，2008）

「少年 A」の父母,《「少年 A」この子を生んで……父と母 悔恨の手記》，（東京：文藝春秋，2001）

中島岳志，《秋葉原事件 加藤智大の軌跡》，（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13）
夏目漱石，《漱石文明論集》，三好行雄編集，（東京：岩波書店，1986）
村上龍，《寂しい国の殺人》，（東京：シングルカット，1998）
村上龍，《無趣味のすすめ》，（東京：幻冬舎，2009）
元少年 A，《絶歌》，（東京：太田出版，2015）
湯浅誠，《反貧困—「すべり台社会」からの脱出》，（東京：岩波書店，2008）
洋泉社 MOOK，《アキバ通り魔事件をどう読むか！？》，梨本敬法、渡邊秀樹、
依田弘作、神山光伸、岩田和明、雨宮郁江、大西史恵、工藤周作 編集，（東
京：洋泉社，2008）

2 週刊雑誌

齋藤剛，〈独占スクープ!秋葉原連続通り魔事件そして犯人（加藤智大）の弟は
自殺した〉，《週刊現代》，2014年4月26日號，頁56-61，（東京：講談社）
週刊文春〈被害者遺族への2億円賠償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のか？少年A「手記」
出版 禁断の全真相〉，《週刊文春》，2015年6月25日號，頁22-29，（東京：
文藝春秋）

3 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1) 中文

李茂生，〈隨機殺人事件的成因與對策初探——一個不可能的任務？〉，《犯罪與刑
事司法研究》，26，頁113-123，（新北市：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20
16年12月）
許瓊文，〈新聞記者採訪報導受害者應面對的新聞倫理：多元觀點的論證〉，《新
聞學研究》，100，頁1-55，（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2009年7月）
陳祥、孫立杰，〈當「偵查不公開」遇見「新聞自由」：警察機關與媒體記者的衝
突拔河研究〉，《新聞學研究》，101，頁89-138，（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新
聞系，2009年10月）
劉育偉、許華孚，〈以鄭捷北捷隨機殺人案之生命歷程探討暴力犯罪成因及其預
防〉，《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18，（法務部犯罪防治研究中心，2015）
羅文輝、張璿文，〈台灣新聞人員的專業倫理：1994年的調查分析〉，《新聞學研
究》，55，頁244-271，（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1997年7月）

(2) 日文

大石泰彦，〈報道倫理に関する一考察—日仏の制度を比較して—〉，《関西学院

大学社会学部紀要》,94,頁 17-28,(関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研究会,2003)
大月晶代,〈犯罪被害者の情報と報道のあり方〉,《レファレンス》,56(8),頁
53-70,(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調査及び立法考査局,2006)
木村隆夫,〈秋葉原無差別殺傷事件,加害者 K の育ちと犯罪過程の考察〉,《日
本福祉大学子ども発達学論集》,6,頁 65-85,(愛知:日本福祉大学子ども
発達学部,2014)

4 網路資料

(1) 英文

Morton, Robert J., Tillman, Jennifer M., Gaines, Stephanie J. Serial Murder:
Pathways for Investigations. December 3, 2017, retrieved from U.S. Depart
-ment of Justic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Web site: [https://w
ww.fbi.gov/file-repository/serialmurder-pathwaysforinvestigations.pdf/view](https://www.fbi.gov/file-repository/serialmurder-pathwaysforinvestigations.pdf/view)
Morton, Robert J., Hiltz, Mark A. Serial Murder: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for Investigators. December 3, 2017, retrieved from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Web site: [https://www.fbi.gov
/stats-services/publications/serial-murder](https://www.fbi.gov/stats-services/publications/serial-murder)

(2) 中文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台灣新聞媒體可信度研究報告〉,2015年,取自:
<https://goo.gl/DpJHs4>,2017/12/11 閱覽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陌生者間(含隨機殺人)之犯罪特性與防治對策研究〉,
2017年11月10日,國立臺北大學受委託研究,取自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
罪防治研究資料庫:<https://www.tpi.moj.gov.tw/ct.asp?xItem=443906&ctNode=35602&mp=302>,2018/1/30 閱覽
鄭郁萌,〈看看日本想想台灣 我們該怎麼讀殺人犯的書?〉,2016年4月14日,
取自壹週刊:<http://www.nextmag.com.tw/realtimenews/news/37892019>(上
篇),<http://www.nextmag.com.tw/realtimenews/news/37892363>(下篇),
2018/1/6 閱覽
謝煜偉,〈鬼島生與死:人、人魔、殺人魔(Life and Death in Taiwan: Humans,
Human Monsters and Those Who Kill the Monsters)〉《「鬼島」生與死:
2014台灣國際廢死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gainst the Death Pena
lty: Life and Death in Taiwan》演講稿,2014年12月6日,取自廢除死刑

推動聯盟：<http://www.taedp.org.tw/node/2769>，2017/6/14 閱覽

(3) 日文

Business Journal，〈“加害者”家族の現実 失われる日常、自殺、退職、執拗な脅迫…広く親戚にまで影響〉，2013年5月26日，取自：http://biz-journal.jp/2013/05/post_2182.html，2017/12/10 日閱覽

NEWS ポストセブン，〈元少年 A「手記は 100 万部売れる」と豪語 今の売れ行きに不満〉，2015年9月11日，取自：<http://news.livedoor.com/article/detail/10576922/>，2018/1/6 日閱覽

警察庁，〈平成 17 年の犯罪情勢〉，2006 年，取自：<http://www.npa.go.jp/toukei/seianki2/20060424.ppd>，2017/5/26 日閱覽

総務省情報通信政策研究所，〈平成 27 年 情報通信メディアの利用時間と情報行動に関する調査〈概要〉〉，2016 年 8 月，取自：http://www.soumu.go.jp/iicp/chousakenkyu/data/research/survey/telecom/2016/01_160825mediariyou_gaiyou.pdf，2017/12/21 閱覽

東京都人権啓発センター，〈加害者家族支援への道のり 負の連鎖を断ち切るために〉，《TOKYO 人権》，59，2013 年 8 月 30 日発行，取自：https://www.tokyo-jinken.or.jp/publication/tj_59_feature.html，2017/12/10 閱覽

法務総合研究所，〈研究部報告 50 無差別殺傷事犯に関する研究〉，2013 年，取自：http://www.mmo.go.jp/housouken/housouken03_00068.html，2017/5/26 閱覽

毎日新聞，〈加害者家族支援 「人ごとではない」〉，2017 年 9 月 6 日地方版，取自：<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170906/ddl/k39/040/553000c>，2017/12/10 閱覽

渡邊和美，〈通り魔殺傷事件の加害者特徴〉，新たな行動計画策定に関する有識者ヒアリング（第 2 回）首相官邸犯罪対策閣僚会議，取自：<http://www.kantei.go.jp/jp/singi/hanzai/hearing/dai2.pdf>，2017/6/14 閱覽

5 電子資料庫、新聞網站

(1) 中文

《TVBS》，取自：<https://www.tvbs.com.tw/>

《中時電子報》，取自：<http://www.chinatimes.com/>

《公共電視》，取自：<https://info.pts.org.tw/sitemap.html>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取自：<http://www.atj.org.tw/>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取自：<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自由時報電子報》，取自：<http://www.ltn.com.tw/>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數位典藏檢索系統》，取自：
<https://digital.jrf.org.tw/>
《聯合知識庫》，取自：<http://udndata.com/fullpage/>
《蘋果日報》，取自：<http://www.appledaily.com.tw/>

(2) 日文

《IICP 情報通信政策研究所》，取自：<http://www.soumu.go.jp/iicp/>
《The Sankei Archives》，取自：<https://webs.sankei.co.jp/>
《青空文庫》，取自：<http://www.aozora.gr.jp/>
《朝日新聞データベース 聞蔵Ⅱビジュアル》，取自：<https://database.asahi.com/index.shtml>
《中日新聞・東京新聞記事データベース》，取自：
<https://ace.cnc.ne.jp/clip/GU200>
《毎日新聞 毎索》，取自：<https://mainichi.jp/contents/edu/maisaku/>
《予告.in》，取自：<http://yokoku.in/>
《ヨミダス歴史館：データベース：YOMIURI ONLINE（読売新聞）》，取自：
<http://www.yomiuri.co.jp/database/rekishikan/>